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

2015年第2期 总第15期



- 李宏图教授访谈录
- 王晓笛：草根霸权：台湾网络世代的大众狂欢
- 陈曦：俄乡纪行——面对俄罗斯青年，我们准备好了吗？
- 刘力铭：新闻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评纪录片《米字方向》

靡不有初，寤志有终。

冯绍雷

沟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启发智慧

砥砺思想

分享知识

奉献感悟

吴文

庆祝无意义，叫卖很刻奇

刘畅

七八月份，是读书人的清凉天。七月中旬，香港书展前脚刚走，八月下旬，上海书展后脚跟来，张爱玲笔下的双城至今书卷气尚存。窦文涛说，香港人思想贫瘠，书展是幸存的“文化绿洲”。在我看来，上海书展却不尽然。

文化人总爱搞点噱头，今年的“香饽饽们”名头倒也不小，艾伦·李、马塔斯、博尔赫斯、木心、金宇澄、格非——这些人中有倍受全球托尔金迷热捧的《魔戒》“魔法师”；也有90年代红极一时，匿迹十余年又再度被炒热的阿根廷天才；有被陈丹青挪来搬去，回忆不够再补遗的“人间狷狂”；亦有横空出世，让梁文道拍手称好，写尽世间繁花的上海爷叔。

文化人太热闹。

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样子大抵是背个包，携柄伞，孑然一身，读书人的状态大概是优哉游哉，不急不赶，看到喜欢的书，摩挲到舍不得放下，不喜欢的居多，不过也不必嗤之以鼻，不去碰它就好。博尔赫斯、木心、金宇澄我也读，看到奇妙之处也必会心一笑，但也没到在读书节目上连讲一个礼拜，拍案惊奇的程度。

米兰·昆德拉讲“刻奇”——“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在这里，刻奇是一种情感的绑架，第一颗眼泪顶多算是“矫情”，而第二颗企图“和所有人类一起感动”的眼泪就是“刻奇”了。

然而，刻奇并不只是情感的绑架。

刻奇还是审美情趣的绑架，接头巷尾一片“南山喃，北秋悲”。

刻奇也是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绑架，小确幸被认为是“文化无意识”的政治认同。

刻奇甚至是文化阅读的绑架，不读博尔赫斯、木心、金宇澄，你还是文化人么？

我反感刻奇，所以《闻道》尽量不刻奇。办刊将近五年，可喜可贺，但每每念及亦很可怕，数字越大，历史包袱越重，“传承”、“创新”都是让人生畏的标签。莫不如诸君也做回读书人，权当逛书展时不小心邂逅《闻道》，拿起来，喜欢就多翻翻，不对味则放回去，有感悟就多聊聊，不感冒也无妨碍。

《闻道》会做，但不叫卖，毕竟庆祝无意义，叫卖很刻奇。



闻道

2015年第2期
总第15期

主 编：
刘 畅

副主编：
过梨雨 刘娅楠
王志浩 杨 静

编 辑：

陈子越 过梨雨 华 盾
刘 畅 刘娅楠 孟 舒
王志浩 杨 静 张洪玉

封面题字：

冯绍雷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目 录

卷首语

庆祝无意义，叫卖很刻奇…………… 刘 畅

学人讲坛

李宏图教授访谈录
…………… (1)

聚焦台湾

草根霸权：台湾网络世代的大众狂欢
…………… 王晓笛 (18)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洪秀柱
…………… 王晓笛 (22)

马英九走后怎样
…………… 李帅宇 (25)

读万卷书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一场怎样的革命？——由《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谈开
…………… 李括 (28)

以华夏观华夏：重拾先秦古典思想在中国崛起中的价值——《华夏主义》书评
…………… 张家铭 (44)

行万里路

· 俄罗斯
印象莫斯科…………… 王韵涵 (51)

俄乡纪行——面对俄罗斯青年，我们准备好了吗？
…………… 陈曦 (55)

学习与反思之行——记第五届莫斯科暑期学校
…………… 朱文清 (59)

- 法国
- 巴黎印象.....丁端 (62)
- 土耳其
- 感悟土耳其.....杨一帆 (65)
- 中国
- 北京大学 - 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暑期班体验.....王志浩 (69)
- 上海交大 - 密歇根大学暑期社会科学方法培
训班回顾.....任伟 (74)
- 上外区域国别研究暑期学校随感
.....刘娅楠 (76)

漫说时事

..... (82)

百花齐放

新闻人,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评纪录片《米
字方向》
.....刘力铭 (83)

大师戏笔今犹在, 梦中红楼未可知——读《大
汗之国》有感
.....刘畅 (87)

如歌的行板.....赵舒婷 (92)

百家争鸣

..... (94)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 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 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闻道》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 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本刊坚持“以学术为主, 不惟学术, 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 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 座 414 室

邮编: 200062
邮箱: ggwendao@gmail.com
网站: <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 未获本刊事先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学人访谈

李宏图老师访谈录

学人小传

李宏图，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欧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欧洲近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社科基金等项目。2013年秋季学期在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



《问道》：是什么让您走上思想史研究的道路，并一路走到现在？

李：我从事思想史研究，最开始其实谈不上兴趣。我本身是学历史出身，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得益于我的导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养冲先生。先生在研究和招收研究生方面一直是有两个方向，一是法国史，另一个就是欧洲近代思想史。在80、9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青年学生们都对思想史有兴趣，77、78级的学生在几百人的大礼堂听思想史的课。欧洲思想史、民主自由等观念对中国80年代思想的解放是有启发意义的。

从学术的体制化建设的角度来讲，思想史当时仅是作为本科生课程，并没有学术性的建制。后来，学术建制化过程开始，设立了欧洲近代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点。为了培养这个方向的硕士，就要有老师移到这个方向上

来。当时没有老师愿意移到这个方向上来，但还是有一些老师例如尤天然、洪波教授等当时都已经 50 多岁了，仍然愿意转移到了这个方向上，开始新的学术领域研究。90 年代后期又有了一个契机，学校可以自主设立博士点，于是欧洲近代思想史这一硕士点就成为了博士点，联合学校其他系科例如哲学系一起建起了博士点。由此又有一批老师进入到的这个博士点带学生。例如沈坚教授、童世骏教授、留日博士郭海良副教授等人，我也成为这个博士点的负责人。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读硕士的时候也没有对思想史有特别的兴趣，博士开始转入到思想史方向，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后来毕业后随着思想史学位点的建设而就自然进入到了思想史这个方向的研究。

所以站在今天来看，我自己从事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经过理性设计的。无非是因为在学术体制化过程中建设了硕士点、博士点，当时就必须要有人在这方向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本人的学术成长实际上也是学术研究在成长中分化与发展的一个产物，是学术成长与建设过程中的自然结果，并不是我自己有意的设定。这与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教育有关，要有奉献精神，时刻听从集体的安排。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当我一想到自己要开始在这个方向带学生的时候，立马就冒出这个问题，要是学生问我什么是思想史我该怎么回答呢？正是为了要解答这一问题，也是要化解自己的压力，于是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你们会注意到，我自己的思想史研究一直聚焦于两方面，一是思想史理论和方法，二是思想史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其实这都是因为教学需要才使自己展开研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对思想史有兴趣了，因而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在整个社会的进程当中，或者说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追求物质和利益的行动背后总有一种观念在推动并引领你的行为。因此，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去研究具体的、实践的行动层面；另外一个就是追溯他行动背后的理念，也即思想观念的层面，这个理念层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史。相比一般的历史叙事，思想史更能够挖掘出支配行动背后的动力，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展开行动的基础。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思想史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因为你要去了解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到底是什么，它又如何汇合成为了一种集体性的认同。正是在这一视角下，不仅需要去分析一种思潮，例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思潮，还需要分析民众的社会观念。不仅在宏观上把握民众的社会观念，还需要微观上来

具体分析某个区域、某个群体，甚至某个小范围的群体以及个体的情感、态度等思想观念的表达。所以说，思想史的领域既宏大又微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因为你总是要去不断地挖掘，但这种挖掘使思想史研究成为一项很耗时的工作。当然要把一种已经尘封或者已经遗忘在历史当中的内容再次打开与揭示出来，这当然是既费力又耗时的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正因为这是一件充满思考的挖掘，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是一种“知识考古”，由此也就充满了无穷的魅力。

《问道》：您认为思想史是充满魅力的，那它对我们当代人的政治生活或者社会生活有哪些实用性？

李：我觉得不能用“实用性”或“有用性”这样的词语来理解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不是说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定会直接有助于现实，实际上，历史起不到这样直接的作用。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最大用处在于考察其历史进程。历史上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实践表现出来的内容，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个体、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党派参与的产物。这个参与的过程，各方力量的博弈，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历史上呈现出的制度安排，或者说一种面貌和特征。

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例，欧洲建立起了那样一个自由的体制、人权的体制。但如果去看《人权宣言》，它的理念和它之后的实践，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当时有六个小组在起草《人权宣言》，最后以穆尼埃这一小组起草的文本为基础，在综合了其他小组的文本之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权宣言》。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人权宣言》是这么多人参与其中，博弈之后的产物。并不是说我说了算，就是我的理念产物。再比如《人权宣言》颁布之后的实践阶段，西哀耶士提出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概念，有些人不能成为积极公民，他就被称为消极公民，也就是说要有选举权，要有责任，要获得选举权、被选举权、财产限制。但从实践角度看，制度安排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妇女提出《女公民权利宣言》进行抗议。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历史就像一个舞台，多方的力量都在那里产生，在那里博弈。但最终胜利的一方按照他的理念构建了这样一个体制性的安排，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体制的安排。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主导性的体制或者内容的形成，第一，它是历史性的，它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第二，它是多方力量的博弈，有一方胜利了，因此就会按照胜利者的方式前行。就像毛泽东所说：改造世界，建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只看到被它建构形成的事件，其实在那背后，各种力量博弈的世界更值得探讨，因为每个个体、每个群体都在他们的世界观，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下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多样性的视野。不能说只认可某一个主导群体，其实它背后还有许多群体参与其中。这样你就会发现历史的多样性、历史内涵的多样性以及历史进程所可能变成现实的多样性。我们今天看到的主导性，只不过就是在当时多样性中的一个胜利方而已，而参与这一过程的其他各种群体未必就没有价值。

由此，也就需要回答西方思想史研究究竟意义何在？历史研究能否为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的答案？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思想史是为了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找寻延续至今的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以便解决我们今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困境。例如历史学家伍德就认为，人们在过去对解决社会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和思考也许有助于当代社会的人们。而剑桥学派的代表昆廷·斯金纳则认为，上述这样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认为在思想史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永恒问题；二是将历史当成直接解决我们自身当下问题的重要资源，具有其现实主义的功用。他以研究霍布斯的思想为例写道：企图理解霍布斯的理智世界，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事业，但如果希冀把它的文本当作一面镜子映照我们自身当前拥有的各种假定和偏见，则很难让人产生真正的兴趣。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霍布斯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和奇异，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寻求关于解决我们自己现实问题的答案而转向他的世界，不用说，我们将会使我们自己的理智生活走向枯竭。一个更为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以一种不太强烈的“关联”感来对待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研究越展开，越会获得某种历史的视野，这将会帮助我们抵御当前的某些假定和思想习惯，并促发我们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对过去的研究，当它揭示出与当前的种种对比甚至差异，而不只是说明与当前的种种延续性时，并非一定只有较小的启发意义。这就意味着，研究过去的思想家如何对待政治和社会的概念能够使我们审视目前那些仿佛非常棘手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问题。试图从思想史中直接找到解决

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错误。而从过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具体的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观点将会给我们一种警醒，研究者不能仅仅从思想史的研究中找到一些结论提供给社会的民众，而是要更为深入地思考：在历史的实践中各方力量如何参与其中，他们又是在什么样思想观念的引领下进行着这些实践，为什么有些实践成功了，甚至变成了一种体制化的安排，而有些失败，以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思想史的复杂就在于，尽管作为一种社会实体性内容已经不再存在，但其思想观念也许从未消失，不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同样，思想史更为迷人之处在于，即使一些思想观念占据了主导性，但其本身也是吸收融合了其他思想观念之后而形成，有如十八世纪的启蒙和反启蒙；或者在“他者”的对立中而被定义，如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思想史的功用自然体现在：通过对不同思想观念之演进的梳理，不仅在长时段中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变化，而且有助于人们反思今天我们接受某种主导性观念的独断性和必然性。因此，思想史就给了我们一种反思性的力量和学术资源，有助于我们形成开阔的视野，并从这样的唯一性和偏狭性当中解放了出来，修正、更新并重建我们的思想观念。由此，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挖掘它，让其呈现出这些瑰宝的内在价值。上述这一启示只是在历史时间的维度内进行的思考，从空间的维度来说，研究另外一种空间，思想观念的西方特性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从比较的意义上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比较性的价值取向。在我看来，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将会在“空间转向”的维度下展开，并带有鲜明的比较史研究的取向，这也将是今后学术创新的新起点，和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宝贵学术资源。

为此，端正思想史研究的态度，既无需追求读史使人明鉴的古训，也不必为历史研究的无用而自寻烦恼。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可以仅仅出于个体的兴趣，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讨，出于对历史上遗留的多样性瑰宝的好奇和追求，学术研究的动力原不过如此。同样，对于读者而言，对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喜爱，不能仅仅出于某种既定观念的支配，而应切记，思想史研究只是丰富与扩展自己理解社会的视野，并进而转化为参与社会实践、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力量，人们不必也不应当试图从思想史研究者的结论中找到一些直接有助于自己的答案。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研

究就像一个宝库，藏着丰富的宝藏，就看我们如何挖掘。只有在挖掘后才可以说他对我们今天的作用，去修正我们今天的观念，去建构我们当今社会的实体内容。历史的多样性、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以及它与社会实践及社会实体性建构内容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值得我们去讨论。使我们不会偏向，不会狭隘。这可能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闻道》：这算不算是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的结合？

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结合。因为我们需要讨论，当一个基础的思想观念变成国家的外交政策并实施的时候，这个环节里各种要素，哪些要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什么造成了政治家的抉择？这是需要理解和把握的重要问题。思想史给我们了一个视角，在历史当中无法简单地说“对”和“错”，我们要进行分析。有时候，历史选择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你的选择，如托克维尔所说，社会的民风民情决定着社会的行进。思想史的研究只提供一个国际关系的基础，如何把他变成国际关系体制化的安排，如何真正实施成为一个外交政策，我们要去讨论这里面的多种环节、多个要素。所以我常说，不能在一个理念下、在大而化之的政策下去思考问题，要在多个要素、多个环节的动态关系中揭示出来，这样才能理解最后的行动和后果。因此，虽然我们研究的是国际关系，但在某些方面来看这也是历史研究。如果把这一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将会更有受益。

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拥有许多不同观点的伟大的思想家，即使存在矛盾，即使观点不一，却给我们带来启迪与深思。

《闻道》：我们作为个体在研究历史、观察历史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带入自己的价值观和个人判断。借用卢梭在《爱米尔》中提到的“理性”和“情感”两个概念，您觉得这两种途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分别在什么地方？

李：每个人都是处在现实当中的人，就像柯林伍德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都是当代史”。但历史学研究的主体（研究者）是生活在当下的，并受当下的影响有着自己的世界观。这样反倒使历史研究呈现多样性。假

如我是自由主义者，我可能会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去看历史；假如我是保守主义者，我可能从保守主义的视角去看以前的观念和歷史；如果我是民族主义者，我就从形成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视角去看历史。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恰恰使历史研究更加丰富了，更符合我刚才讲到的多样性的呈现，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他生活在当下，一定受当下背景的影响。这个背景包括很多：出身、社会地位、职业、家庭影响等等。这就牵涉到你刚才讲到的卢梭的问题。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理性的，要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但是在这当中，人怎么会没有情感？这是无法想象的。我同意卢梭的观点，从一个孩子的教育层面来讲，情感与理性两者缺一不可。

上课时我给你们讲过密尔，密尔小的时候缺少一个，他的父亲按照“理性”的方式来教育他，没有玩伴，没有玩具。结果 20 岁的时候，他精神失常了，这就是情感性不够。小时候的教育更多的是情感方面的：感觉、认知、想象力、社会性、合群性等等。当他成长的时候也要通过教育，提升他的理性、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所以说理性和情感的教育都不可缺少。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卢梭可能是情感至上，而密尔是理性至上，但我认为密尔的情感教育是有缺陷的。当然，有缺陷并不影响他成为思想家。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来讲，我还是希望二者平衡。

回到历史研究的角度，每个人在他自身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按照观念的引导来从事他的研究，形成他的偏好，或者是固执的坚守他的理念，我认为都不存在对错。就像我们今天讲，有些人是民族主义者，虽然网上很多人批判，但是你不能说这些人的存在完全不应该，这是一个边界。这些人要这样去表达，这是他的一种权利，他有自己思考问题的维度和高度，不可能所有人都像大思想家一样去思考。社会也是有多多样性的。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只不过这样的一种表达要交给政治家进行选择，用民族主义还是其他理念作为政治决策。包括在对外关系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和国内的思想表达联系在一起，政治家必须在多种表达之间进行选择。比如现在中国对日关系中，存在支持战争、支持“反日”的民族主义者，我认为这样思想的存在没有关系，关键是当思想变为外交政策并实施的过程需要政治家来进行判断和最终做出决策。所以，从社会多样性的角度来讲，民众可以表达各种观点，普通民众和精英一样有表达的权利，并无对错之分。如果错，也可能错在政治家选择了某种不合适的思想，并把他变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則。这个中间的复杂性是需要研究的。

《闻道》：托克维尔在描写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时，曾讲到孟德斯鸠、洛克等是御用文人，而伏尔泰和卢梭就像是体制外的学者，这两方的思想有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他们为什么都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他们自己追求的又是什么？

李：这涉及到对启蒙运动的理解。我们以前看来，启蒙运动是一个整体的思想运动，但是我们在关注整体性的时候忽略了内部的差异性。所以在今天很多历史研究开始注意到历史内部的差异性，而且它内部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

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在政治理念、对未来的政治体制的建构上差异性很大。但不能因为差异性就说他们不是启蒙运动其中的一个成员。启蒙运动的目标是批判旧制度，在这个层面上看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批判现实上他们有一致性，只是在建构未来的问题上存在差异性。

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是否妨碍了他们的整体性呢？也不是的。我们现在把十八世纪的这些思想家都看作一个具有整体性的集合。这些不同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不是思想上的不同类型，而是他们身份上的不同类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要在整体和个体上来判断。并不是说伏尔泰和卢梭就不是体制内的。如果按程度划分的话，我觉得孟德斯鸠是体制内的，后来孟德斯鸠也变得不是体制内的了。他自己原来是贵族，也是法院的院长，他把职位都卖掉了，自己得到了一笔钱在写作，他已经跟体制没有关系了。

启蒙运动是在贵族沙龙里成长的，这跟苏格兰启蒙运动完全不一样，他们跟体制是保持着极好的关系，我们不要把启蒙运动理想化。启蒙思想家既要推翻这个体制，又利用、寄生在这个体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或者是他们的高明之处。如果你站在体制外直接对抗，可能直接被消灭掉了。我现在就等于是打进敌人内部，寄生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当然贵族也需要，也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都不要理想化，这就需要细致的历史研究。不能简单地想象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是拿着机枪冲锋打仗，其实不是这样，他是在体制内生存下来，并利用了旧制度的弊端成长起来的。伏尔泰就利用了旧制度贵族的特权。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狡猾”的人。由此引申出一个历史的评价，道德和观念到底怎样判断。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这个人做人不地道。但是从思想贡献角度来讲，他利用这些成长，传播思想，这是一种双赢。这是复杂的历史，这是

历史研究的艺术，让我们不要贴标签，让我们不要简单化，让我们更复杂全面地来看问题。

《闻道》：您上课时讲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同学产生出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种贵族的、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因为他们是贵族，所以可以不愁生计地在火炉边惬意地思考问题。但还有一种想法是“我做故我在”。那么人类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思”还是“做”？

李：我认为，这要在具体的语境和背景下去分析。一个人没有运用理性来思考的时候，只是依附与盲从，“我”本身就不存在了，“我”的主体性就不存在了。如果完全相信领袖，那我们不会去问为什么。宗教信仰也是如此，宗教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去怀疑，不能用理性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才会说“我思故我存”，“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这个“我”不是实体上的我，而是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我”的存在。

但我也同意，在这个意义确立之后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性的活动，而这个实践更能证明我的独立性。我思考了，我怎么去实践，不仅仅是指像工人或农民一样劳作叫做实践。其实推理、写作、思考本身都是一种实践，这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我思”这个行动本身不只是说纯粹在大脑里思考。思考本身就是行动，或者说我可以把思考活动写下来。所以“思”和“做”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对立起来。这就是今天语言学转向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笔为利剑”。你的语言就可以像刀一样的把人杀掉，语言表达与修辞可以和真实的拿刀杀人产生一样的效果。所以在实践这个层面，我们不要把“做”仅仅理解为微观的、具体的行为。

《闻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我思”是在我自己思维层面上的思考，而“做”是我去影响周边的人。

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不要忘记前面提到“思”本身就是行动。不要把“思考”看成形而上的局限。“思”是行动，写出来也是一种行动。从“思”开始，本身就是实践性的行为，后面引申出的其他“做”的环节。我们不能只把后面的环节当作实践，而把前面忘掉了。思考行动本身的开始就意味着主体已经开始了行动。这样就可以把自主性从原来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从今天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制定外交政策的行动，其实从新闻发布会、从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就意味着行动的开始。语言就是行动。新闻发言人的修辞方式，值得研究。比较美国的新闻发言人或是其他国家的外交阐释方式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阐释方式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这个可以做成一个研究论文。

“中国梦”作为当今热点话题，看似全新的概念，其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利用“概念史”的观点可以对此提出一个全新的认识。

《闻道》：最近有一股关于“中国梦”的讨论热，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作为历史学者，您觉得“中国梦”是不是中国自己提出的一套区别于“美国梦”的概念。

李：这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一任领导班子总是要提出自己的执政理念。其实，接着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就挺好。因为从思想史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英国人思想家如欧文、霍布豪斯已经提出来的“和谐社会”的概念，也不是我们自创的。我觉得“和谐社会”也的确反映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不够和谐，社会冲突很严重。我觉得继续按这个方向走也很好。但我也可以理解习近平，他的年轻使他更有抱负，更有想象力。但我觉得提出的时机有些不恰当。如果他在跟奥巴马对话的时候提出来，这个时机就很好，就不是政治家制造的空洞概念，而是说我们利用这样的场合将它发布出来，以后我们再把它宣传出来。这就说明政治家选择的时机非常重要。

美国的确是一个充满美国梦的国度，他们提出了这个概念。美国建立的时候，所有欧洲人都把那里看作是一片新大陆，人们要去那里实现梦想。独立宣言里提到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美国梦的核心。如果习近平跟奥巴马会面的时候谈对美国梦价值观的内在理解，然后回过来说我们中国现在也要让每个人都能像美国人一样被提供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赋予追求他们自己幸福的权利则更好。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能达到的高度，这不是跟美国独立宣言提到的追求幸福的含义是一样的吗？这时候官方再把它进行演绎不就是很自然，也很体现习近平的思想。但是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梦”让人一看就是一种政治宣传。所以我认为政治家在这个地方做的不够聪明。

回到中国梦本身，每个人作为人来说都有一个梦想，未来的理想。人有人的抱负，国家有国家的抱负。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提出这个口号也没什么错，作为鼓动激励人的一种概念也没什么错。关键是不要将它意识形态化。年轻一代都很反感的。这就是思想史告诉我们的，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传播方式，现在年轻一代的阅读方式和接受方式与从前是不一样的了，必须好好研究这些。而且年轻人的话语体系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你的梦，你的中国梦，对他进行解释时必须体现出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现社会当中占主体的群体，它的基本态度和观念以及它的需求。如果“中国梦”只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只不过是延续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想要富强的传统愿望。

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要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但是把“中国梦”变成以这个为主导，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可能都不能认同。这个牵涉到差异性。“美国梦”指的是人们都有实现幸福的权利，都有机会实现个体的价值和个体的成功，就算追求的结果失败了，但是那个过程是有吸引力的。美国的西部开拓、西进运动就是“美国梦”实现的召唤。现在如果要去政治动员、社会动员，那必须要思考，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内涵是不是能够真正动员起社会的主要群体。这就是从思想史传播的角度来回答刚才的问题。把他看作文本，每个群体阅读后的理解是有差异性的。必须考虑到一种思想观念的提出是否能够成为主流的价值观，而不是硬灌输给社会和人们。

《问道》：“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是否在于“美国梦”关注美国人自己切身利益，他们更关注个体；我们更关注集体，是整个群体，整个社会中强加于个人的“理想”与“梦”？

李：对，这就是我刚刚没有明说的，“美国梦”就是要让每个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我们“中国梦”就是把现在民族国家的复兴作为第一任大事，似乎可以牺牲某些群体。这就涉及了未来国家的建构到底是以“个人”为基础还是以“群体的目标”为基础？这个群体的目标是什么人赋予了它作为一个目标？那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有些政治家说我们必须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就如报纸上所说“离开了祖国我们什么都不是。”那这也让人们回到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讲的“专制之下无祖国。”“哪里有幸福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因此在这个层面下，必须思考政治家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

时候，你能够运用什么资源才能实现真正的动员？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阅读史，传播史，接受史的问题，从历史学的方法来做，也就说你要用历史的维度和多样性来了解了解“美国梦”，也包括19世纪工业革命“英国梦”的说法，“英国梦”就是一批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人认为境况改变了，生活水平提升了；资产阶级则认为钱挣多了，并且教养提升了，变的更绅士。当然“英国梦”不是主流，“美国梦”是主流，成为社会一个共有的像价值观一样。

《闻道》：每种思潮都有不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背景，在这个概念上，“中国梦”和“美国梦”本身就不可比较。美国的精神就是个体，而中国自古以来注重集体？

李：说到这个问题，就必须需要思考中国未来的成长，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考虑每个人的幸福和理想，不能像《人民日报》所讲的“离开了祖国我什么都不是。”我个人认为：只有“我什么都是了，祖国才是，祖国才强大。”因此，这两种逻辑是不同的，只有逻辑转变了，社会的建构才变化，用这个例子就更能够说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观念的不一样，对体制的建构就不一样，美国以个体为目标，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流动性更强，因此社会所有的一切应该按照这种价值来进行安排。同样“中国梦”如果是以“国家民族复兴”为基础，那就是“国家主义”至上，只要某个群体或者国家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那么个人或某个群体，甚至所有人的利益就可以被牺牲。例如：为了保持大国地位，追求GDP高速增长，就牺牲了环境。所以思想观念不同，社会的整个建制和安排就会不同。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中国梦”并不是说不可以提，因为政治家需要用口号来动员，但是怎样宣传与传播这种技术层面上需要好好研究，更重要的是其内涵是什么需要好好设计，特别是要针对今天的现实来设计。现在感觉就是把“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换了个帽子而已，实质的内容还是这样的。

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将此变成思想史的文本来解读，还可以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研究。我再次强调，并不是这个概念不好，而是第一：它传播的方式不好；第二：它界定的内容有待商榷和丰富。

《闻道》：您曾在课程中提到“概念史”，即中国在和其他国家讨论一些概

念和观念的时候，使用的是在他们话语体系下对这些概念的解释，而我们首先要完全理解这些概念，进而重新定义这些概念。

李：概念史研究中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在于，概念是凝固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的产物，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承载意义的基本单位。它承载着社会的基本意义，承载着社会的基本内容，通过它理解这个社会，再通过它建构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概念史本身的研究在于能否分享一个共有概念，怎样分享，怎样“再概念化”。举个简单的例子，“阶级”、“工人阶级”——这是欧洲工业革命后产生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用“工人阶级”的概念来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你会发现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农民工，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有相似性：脱离农村在城市居住；在工厂里接受资本支配；在城市定居，是新空间当中的成员。但我们的农民工是流动性的、季节性的，而且与农村的土地有联系。用这个来判断，工人阶级是什么呢？我们与他们完全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概念不能用，而是说内容完全不一样。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用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读解我们的“工人阶级”，还是用我们农民工的特性来丰富原来“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呢？这就是差异性所在，而且这个差异性是历史性的。也许20年后，现在的农民工就只是工人了，那么现在就是工人形成的历程，20年之后就回到了英国革命定义的工人阶级的概念上去了。我们使农民脱离了农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形成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到英国那样的工人阶级的状态，这就是差异性的存在。

国际关系同样可以这样表示。人权问题、民主问题，使用中国自身的概念和特征来讨论，还是接受西方的概念？以“人权”为例，中国人难道没有人权概念吗？“人权”这个词已经出现在现代中文词汇当中，这就表明中国人能理解这个概念。在理解这个概念的同时我们也要与之进行对话，不对话就永远只是批评人家，保持这种对立的状态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我们目前犯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我们始终跟他对立，强调我们的特殊性。我们要学会进入、分享，然后再对之进行改造。不能首先排斥，认为我们不跟你谈这个问题。例如这个杯子，说我们中国人不用杯子，而用陶罐，这肯定是说不通的。这个器物本身我们也是能接受他的，只是在内容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此，要进行对话，彼此对人权的理解是什么。

这牵涉到罗伯斯庇尔的人权问题，生存权是基本的人权。为什么罗伯斯庇尔这样讲呢？就因为在当时的战争（反法联盟战争）状态下，普通的

人民群众在粮价飞涨的情况下连生存都存在问题，所以生存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即在政治安排上首先要保障每个人能买到面包，买到粮食。这样体制安排就会不同，政府就不能放任粮价飞涨，要惩治粮商，要对粮价进行限制。而如果完全按照自由、人权的层面上来讲，凭什么要限价呢？限价不是违背了自由、人权吗？在食物短缺时让粮商非得把粮食以低价售出，这个是违背自由原则的。但这里面还牵扯到正义的问题。桑德尔《正义论》中讨论的例子：天天下雨，门口有卖伞的，人们都没带伞。本来5元一把的伞现在卖20元一把，买还是不买。不买就会淋雨生病，买了觉得这不正义。这时又没有第三方的力量来干预他，这样就等于是自由，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但如果这样，穷人的权利该如何保障？因此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才会说，在不同层面上对人权的理解程度存在差异性。问题就在于，罗伯斯庇尔代表的是下层的利益，他胜利了，他就把这个作为一种安排。但这种安排也是短期的。后来又被推翻了，又回到了市场经济，又回到了自由的轨道上去。

我们利用这一个案来说明，不同的群体在对人权内容的理解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这种理解不仅使概念具有丰富性，而且被建构成社会的体制性安排，历史的博弈就在当中展开。不同的时间段，建立了不同的体制，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性安排。回到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是这样，你以什么样的人权内容来理解它，你会用什么力量把它再概念化？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闻道》：中国在国际上对这种从西方过来的概念似乎仍然是疲于应付，并不能够游刃有余地去利用。而类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反倒解决了许多矛盾、争议。

李：在大的框架里我们用社会主义来讨论。“人权”概念不能总是在前面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主”前加“中国特色的自由”，这种东西你没办法这样一一改造。事实上，“民主”的概念，以及将“民主”转化为体制性安排，每个国家差异性很大。西方民主制度变成政治性安排的时候差异性也很大，美国与欧洲的差异性，欧洲的和英国的又不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变得不自信了。其实如果坦诚、自信地去谈，我认为不是不可以的。我要了解你的人权理论，我也谈我们实际的人权状况。每个国家都有他实际的人权状况，并且也都是不甚满意的，别以为欧洲的人权状况都令人满意。所以这里的，人权意义变成了修辞性话语，变成了争夺的焦点，欧洲人总是拿这个作为争夺选民的政

治资源，也是在国际上树立合法性的一个话语修辞手法。

必须要对话，只有对话才能理解对方，理解自己。所有的概念都在互动当中，我们既加深了对他的理解，也深化了对自己的理解。我们作为他者认识西方，同样把西方作为一个镜像，来认识我们自身。这实际上对我们都有好处。这样才能够求得我们在理解他的同时又找到了一种可以改造他，并对他进行再概念化的一种路径。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总是去回避，不去思考肯定是行不通的。单独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而不去寻找再概念化的方式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才应该在外交领域培养既懂西方又懂中国的人才。在读书中训练，形成这样的眼界和视野，比具体的知识更重要。

应该怎样学习？怎样做研究？作为有建树的学者，更作为我们的良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闻道》：您担任了6年上海市高考历史命题组组长，在命题中，您是否也更注重考察学生的思维？

李：从某种意义上讲当然是更看重思维训练，但是思维的训练肯定是和内容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说内容一点都不重要，但我们会挑选最基本的内容，能体现对史学思维、视野训练的内容，而不是考察学生能否记住历史上某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就连我们工作的时候也都忘记了。举个例子，“中共瓦窑堡会议是哪一年开的？”高考会有这样的拉分题，但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教给学生最基本的知识，通过获得最基本的知识和材料，来展现自己的理解，这样你的思维能力就得到了一种训练，而不是不成体系的知识记了多少。

这也牵扯到了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知识是无止尽的，知识是学不完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必须挑选最基本的知识来给学生做基本的训练，进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所以说，要读经典。经典被证明为经典说明他在知识层面是最重要的。从思维能力的获得来讲，通过读经典来获得思维、视野也是最必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熟读经典，这大概是现在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如何阅读经典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对知识的选择，以及知识与思维训练的复杂关系，我们必须要有个把握和认识。

《闻道》：所以就如您说的我们应该多读经典，您是否可以再推荐给国关院的学生更多好的经典著作呢？

李：我自己比较喜欢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还有密尔。密尔他能在那样一个社会当中提出对自由的新的社会转向的概念，他这样一个解释性的思路让我觉得他也是个天才。

但我更加喜欢托克维尔，我更加喜欢从“社会”这个维度讨论问题，托克维尔就是兼社会和政治组合在一起，更加偏向社会来讨论问题。19世纪法国的转型，包括欧洲的转型，它未来道路应该怎么走，托克维尔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在社会转型这个大的维度下讨论民主、自由包括其对革命的反思，对贵族的反思。还有一点，他认为社会需要有精英的气质，无论作为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都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的精神气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人们看的更深更远，视野更广阔，时刻想到些问题，保持思考。从理性的角度，他的出身也使得他更加理性和独立的思考。我认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思想家，他关心人民但又保持距离，同样非常独立自主。当然很多和他一样生活条件好的人却随波逐流，因此他又感到自己的孤独，因为所有的人都效忠不同党派或者皇帝，只有他保持独立，这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一个思想家，我也非常推崇，就是亚当·斯密。他是在经济和社会的维度上讨论社会转型的问题，他找到了“市场经济”的维度，这也是天才。至今为止，我们仍然脱离不了他所提出的概念与解释的体系。他知识面也很宽阔，道德、哲学和经济都广泛涉及，而且也跟社会的现实保持联系，他与托克维尔一样，关心社会，思考社会的问题。所以这点上，思想家有着共同的气质，亚当·斯密关注苏格兰社会的转型，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真正爱国的。

因为思想家都是面对社会困境和难题进行思考，面对这个时代最棘手的问题来思考，为了找到一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和道路。所以说读经典就是跟这批伟大的思想家对话，跟人类的天才对话，他们是一般人不能达到的高度。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跟着贤者学，才会让自己更优秀。我常常讲，如果现在不知道未来干什么的话，时间不要浪费，先读经典吧，这会终身受用的。或许以后不一定做学术研究，但是读经典一定不会错。有时候理想无法设计出未来，那这时，为了不浪费时间，就去读经典，这

是最好的方式。

《问道》：您能对我们学院的学生的学习提一些建议吗？

李：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并不会特别强调思想史，这只是一个维度。大家应该从不同的流派，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路径中，确立一个自己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打基础，到最后会找到自己的偏好，会在某一个方面下功夫更多。就如我，我觉得以往的经历中发现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比较适合我。学习其实就是试错的过程，可能对一个学科有兴趣，但是在学习过程发现并不适合，就会放弃，慢慢会找到自己适合的学科。可惜中国社会不能让人试错，因为流动性和开放性不够，试错的机会特别少，不像欧洲或者美国。

就像我自己做一个大学老师，好像是很好的岗位，似乎成长也很好。但是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岗位，我最喜欢的岗位是基金会，慈善基金会或者学术基金会。学术基金会会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智库”层面，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组成。另一个层面，是组织活动的层面，把钱用于学术前沿性的研究或者学术的推广。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对社会的贡献度更大。例如从学术基金会来说，我认为这个领域是值得做的，可以通过投入资金把一批人组织在一起支持他们做研究。个人做的影响力有限，有一批人来做影响力更大。慈善基金会也如此，更加造福社会，这也与我的观念有关。或许再等 10 年、20 年，中国社会也可以靠你们去组织一批企业家来建立这样的一些基金会吧。



（责任编辑：张洪玉 华盾 孟舒 过梨雨
采访：孟舒 蒋霖望 华盾 张洪玉 过梨雨）

聚焦台湾



【编者按】2014年台湾岛内政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3·18太阳花学运直接冲击了马英九国民党的执政，11月29日的“九合一”选举更是国民党大败，民进党拿下多数县市执政权。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临近，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气势汹汹，历经失败的国民党有洪秀柱挑起选举大梁，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再次出山，为这场选举增加了变数。台湾再次成为了各方瞩目的焦点。

草根霸权：台湾网络世代的大众狂欢

王晓笛*

不久前，旺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台 PTT 不理性言论吓傻大陆学者”的文章，文章引用大陆学者的话，表达了对台湾网络世代言论非理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岸关系倒车的担忧。而就在文章发布的两周前，台湾艺人杨又颖因为不堪网络霸凌，选择煤气自尽，结束了自己24岁的年轻生命。两件事情前后并毫不相连，但却足以让人对网络空间的是是非非胆战心惊。尽管岛内有人士呼吁实行实名制，加强网络监管，但正如香港《大公报》在杨又颖事件发生后所评论的那样“当下台湾民粹主义盛行，这些声音反

* 王晓笛，自由撰稿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倒成为网上众矢之的。”问题的本质，不在是否实行了网络实名制，而在于“网络霸凌”背后的民粹主义逻辑。

一、民粹主义和网络世代的结合

民粹主义的内涵多样，也并未形成一个清晰统一的界定，往往是与某种主义伴生出现。但综合各式各样的民粹主义论述和表现，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共识，即民粹主义是反对精英，强调“人民优先”，要求大民主的一种思潮。乍看起来和民主主义相同，但民粹主义比民主主义更倾向激进，表现上也更加极端。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中，人民是神圣不可亵渎的词汇，因为人民占有先天的道德优势，这会推动一种思维惯性，偏向矛盾中的弱势方，而并不关心真相是什么。但对于谁是人民，却取决于民粹的话



语输出者，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所言，“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在实践中民粹主义者更容易确定后者。”从中不难看出，民粹主义在言论建构上的封闭性和垄断性，而这似乎又与民主的开放多元需求并不相符。

民粹主义的自身建构，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精英和社会团体妖魔化，树立政敌以描述自身，这样便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手段。有别于传统媒体需要专业的训练，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将传播的准入门槛降大大降低，以青年为主体的互联网民意，可以轻易讨伐强调理性的知识分子，消弭政府公共权威，进而进行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动员。其实这种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结合早已有之，阿拉伯之春之时，一条 Facebook 状态，就可能在现实世界串联起一场社会运动。在互联网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是信息输出者，也会成为起着传播中介作用的“意见领袖”。在台湾孜孜以求的公民社会中，公民应该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个体。但根据勒

庞的观点，个人的理性，终究不可避免群体的低智。一个人有着再理性和客观的观点，但在集体狂欢下，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放在“人民”的对立面。更何况，如若出现别有用心的“意见领袖”，那么就会轻易制造话题，煽动民意。

在台湾“选举挂帅”的政治环境下，民粹主义和网络传播都是打击对手卓有成效的利器。在去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中，占有庞大社会资源的连胜文，最终败给了与“婉君”结盟的柯文哲。公允地讲，连胜文的个人能力还算出众，他曾用一句谦卑的问候，摆平了因为缩减军公教福利，对其怒目相视的眷村阿公阿伯。他的选举失败，一是败给了网络宣传，二是败给了民粹意志。在对手有意操作民粹的情况下，他的“权贵”背景，没有办法让他介入话语的修正与解释当中。而其手中所掌握的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在高效率的网络前显得不堪一击。

二、霸权翻转：草根的狂欢



议题是煽动群体效能的很重要的方面。而在一个民粹化的社会环境中，反权贵、反精英、反公权力等霸权势力是一个颇为诱人的口号。在左翼的政治话语中，“霸权”是一个上阶级对下阶级的

概念，是在社会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对相对弱势的一方的权力对应方式。这个霸权有可能是文化上的，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作为社会标准意识形态的树立和衡量；按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即统治阶级享有丰沛的社会资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也有可能是权力上的，即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和管制。不难看出，霸权是强与弱的非对称的关系。或者换一种我们较为熟知现实的具象，比如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非对称的结构中，在台湾社会的认知当中，是公权力压制民众，民众处在权力的弱势地位。

但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何为强，何为弱？强与弱的非对称性，应该有

一个“势”的前提。在军事学中，非对称并非仅指兵强马壮对兵微将寡，弱势的一方可能借助有利条件，化被动为主动。因此非对称不应该预设强弱的既成结构，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判定矛盾双方哪一方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从马政府时代以来，表面上看马政府被部分民运人士渲染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权贵集团”，但更多时候，这个的集团却在推行自己的意志上能力不足，和其“权贵”形象形成反差，甚至被所谓的“民意”绑架。反倒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裹挟着大众反权贵的集体狂欢，在对公权力形成强大制约的同时，也一步步陷入“民粹主义”的深渊，呈现一种失控的态势。借助网络高信息量的产出，一个简单的议题就可以被煽动为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占有道义优势的“人民”，垄断舆论话语，建构了一个非对称的语境，在话语权上对精英、公权力构成霸权，而自身却并不需要付出道德成本。当网络世界的集体情绪被调动起来后，再将其发展为社会运动也就易如反掌。

在太阳花运动中，以青年为运动主体的网络时代则利用互联网霸占话语权，而民进党、台联和部分激进团体因为处于政治目的，在背后推波助澜。当“保卫台湾”、“守护民主”点燃了群体的热情后，整个运动也便进入到了情绪化的狂欢当中，占领立法院、攻击行政院已经说明了群体情绪的失控，这个时候再将其定义为民主运动，反倒是欲盖弥彰。

三、网络民粹的政经根源

民粹主义紧密结合一定的时代背景。网络民粹的出现，技术上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进步，但深层次则存是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进入 21 世纪后，台湾经济发展状况一直不理想。2008 年马政府执政，通过扩大两岸经贸交流，力求摆脱台湾发展停滞的紧箍咒。但两岸交往红利把持在大商人手中，在八年的时间里，尽管在数据上台湾经济有了一点漂亮的成绩，但社会分配问题日渐突出，高房价、低薪资，滋生在社会当中，特别是年轻人当中“仇富”的戾气。政治方面，两党恶斗，政治机能下降，一项政策很可能因为利益角力，而被杯葛，不了了之。政治大学汤绍成教授曾这样对两党做出评述：民进党的任务就是等着国民党犯错，同样的，国民党在野，也在等民进党犯错。当两个政党都在关心对方如何犯错，怎么利用犯错，那么也就没有人真正去思考台湾的未来到底怎么样了。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普通民众对台湾政局失去了信心。民进党在九合一中的大获

全胜。并不是由于民进党表现有多好，而是国民党表现的确太糟糕。某位台湾青年曾在选举后无奈的表示：这里有两个烂苹果，只有挑相对不烂的那一个。在台湾政治和经济交织的社会环境中，民粹主义泛滥，似乎变得合情合理。

要解决复杂台湾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许需要有一个有魄力、高瞻远瞩的领导人，这也是台湾参与政治竞争的政党们共有的许诺。但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之下，选举更像是嘉年华。陈水扁的“总统”选举策略，把台湾的选举拉入了大众娱乐的文化的范畴，能够表演的人才能成为岛内共主，但能力和表演并不一定成为正比。深入骨髓的政经问题，需要领导人的强势姿态，但在岛内“民主拜物教”盛行的环境下，强势领导人很容易勾起台湾民众对“白色恐怖”时代中极权统治的悲惨记忆，强势领导人也会背负侵犯人权的罪名，而被新一轮的民粹运动拉下大位。

台湾是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是也左右为难的台湾。纷繁复杂的时代迷茫了台湾的民众，也给台湾的未来写满了谜题。也正是这样复杂生存环境，给隐士的人们，提供了逃离的“小确幸”心态；给那些不满现状的人，提供了“民粹”的选择，将积压的情绪化作狂欢运动。台湾何去何从，追根究底，民粹也不过是一种回答的方案罢了。

（责任编辑：王志浩）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洪秀柱

王晓笛*

九合一选举后，我和几位台湾朋友坐在一起聊天。当谈到 2016 谁来代表国民党角逐“总统”大位时，大家一阵缄默。后来有人问我的看法，我事不关己地耸耸肩。实际上，对于一个陆生而言，我就是台湾选举的一个局外人，也深怕因为自己的口无遮拦，触犯了众怒。一位朋友见气氛有些尴尬，又想从我口中了解些什么，于是陪我玩起了判断题，从朱立伦到吴敦义，再到王金平，让我给出是与否的出战判断，但都被我不置可否。我的犹豫当然也有很多的根据，但心头萦绕最多的还是对这几个人选的不踏实感。绞尽脑汁之后，朋友轻声提到了洪秀柱，随后自己摇摇头，说不可

* 王晓笛，自由撰稿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能，无根基。尽管当时我对此人还不甚了解，但却打趣说道，没准就有可能你们最不在意的人。毕竟，对于一部故事片而言，最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才是最大的看点。

事实证明，台湾的选举就是一部故事片，而且还很跌宕起伏。

从台北回到上海后，媒体上开始频繁出现洪秀柱的身影，她质问国民党为何还不尽快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言辞辛辣，铿锵有力，如果我是受骂者，一定会无地自容，跑到寂静之处自行了断，不禁让人感叹“小辣椒”



之名号并非浪得虚名。周围的泛蓝的朋友也渐渐对她表示青睐，觉得国民党就是因为少了这样一位敢作敢当的人，八年时间里才过得这么窝囊，也不乏有“干脆让她选‘总统’”

的呼声。我也因此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兴趣，受专业背景的影响，隐约觉得她这样不断刺激党内大佬，是否在释放某种信号？在表达某种决心？

在3月的时候，我随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再次拜访“立法院”。负责和我们交流互动的，正是洪秀柱“副院长”。其实在参访之前，几位对选举有兴趣的朋友，还商定要问问她，是否有意要参选2016年。想杀杀她的威风，刺探一下她的底细。然而真到了面对面的时刻，这群桀骜不驯、忘乎所以的青年，却又变成了训导主任面前一群乖巧的学生。一位侨生率先反水，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变得其乐融融，大家的问题也开始变得简单、客气（包括我）。反倒是“洪副院长”凌厉的反馈，让我们有些招架不住，尽管那样凌冽的言语攻势并不是针对我们。回到宾馆后，一些人懊悔不已，但也深深迷上了这样一位有个性的女政治家，并暗自期盼着两位女性候选人巅峰对决的精彩桥段。

不久后，洪秀柱正式表态参加2016“总统大选”。老实讲，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与其说之前对大佬的质问，是对国民党的恨铁不成钢，倒不如说，是变了法子的为自己造势，宣布参选不



过是顺势而为。我甚至为我能够预测到这一点而沾沾自喜，而在“立法院”和洪秀柱有了一番交流后，我甚至也有些看好她的表现。柯 P 能够成为台北市长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对政治环境的不满，这个和柯 P 有多大能耐无关（事实上，他的执政水平还真的有点问题）。长久的政治乱象，沉重地碾压着台湾人民的自尊心，台湾的政治圈，太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在散发着糜烂味道的国民党旧党国大船上，能出现这样一位正直有担当的舵手，至少对泛蓝而言，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洪秀柱的出现，是九合一“白色风尚”的延续，尽管这次的白取自天空的蓝。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的对洪秀柱都是乐观的看法。至少在初选民调之前，更多的是对洪秀柱的唱衰之声。我在北海道的朋友几段犀利的分析让我哑口无言，最后我只能以“正副参选人”必有其一来结束对话。我也将我的想法讲给了自己学院专注台湾问题的老师，但被老师嗤之以鼻，被批评为看问题太过肤浅。他让我继续关注朱立伦和王金平的动向，因为据他的了解，二人其实早已经蠢蠢欲动，党内征召是必然趋势。诚然，除了对洪秀柱人品的钦佩外，我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证据，证明她能够在大佬纵横的国民党体系中脱颖而出。然而对一个普通的选民而言，大概也不会有人去进行复杂的权衡利弊，投票更多的是一种直观的感受。

或许我猜对了选民的内心，关于洪秀柱的各种民调一路看涨，她的声望也气势如虹。尤其在国民党党内大佬都未领表后，蓝营将胜选的精神寄托，逐渐转移到了洪秀柱的身上。我还记得我在淡江大学的一位学妹，一位蓝营的支持者，一直迷茫于国民党在候选人问题上的勾心斗角，但自从她从“立法院”回来后便对洪秀柱如痴如醉，在洪秀柱宣布参选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她对洪秀柱的支持，热情和忘我的就像洪秀柱的家人。洪秀柱用个人魅力赢得了选民的心，而洪秀柱也以清晰明确的政纲，回馈给支持她的选民，这一点就比擅长打马虎眼的蔡英文强了了很多。对洪秀柱而言，心里有话，不会憋着，做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一中就是一中，反民粹就是反民粹，核电不停就是不停……言辞固然刺耳，但摆明立场，的确比因为投鼠忌器而闪烁其词让人信任。

有网友将洪秀柱和蔡英文的对决，比作小夫妈和大雄妈之间的对决，仔细一看，确实有积分神似。只不过洪绝不是小夫妈那样尖嘴猴腮，蔡也没有大雄妈那样看上去人畜无害。这场选战，太过特别与玄妙，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和期待。7月19日，洪秀柱正式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承

载多少人的期盼。其实洪秀柱最后是成为蓝营的救世主，还是会为国民党的败选背上黑锅，都已不重要。现在的洪秀柱，民调初选高标通过，小额募捐也已经突破千万，她已经达到她从政以来的最高峰，甚至还有可能更高。她以一己之力，驱散了九合一后泛蓝的失利的阴霾，已经完成了一件让人值得尊敬的功勋。百年大党，应该有百年大党的骄傲和坚持，倘若先生还在世，也会为洪秀柱的勇于承担而赞赏有加。当国民党现在的沉闷和颓废正在和民众的期盼渐行渐远时，党内元老们的是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国民党该何去何从了。

（责任编辑：王志浩）

马英九走后怎样

李帅宇*

去年九合一选举的硝烟尚未散尽，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大幕已经拉开。马英九之后谁将成为继任者？未来两岸关系将会又怎样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将随着大选的展开逐渐显示出答案。

当九合一选举结束后，国民党大败，民进党大胜，蔡英文无疑成为了2016年大选的领跑者，甚至可能会轻松获胜。不过当洪秀柱代表国民党挺身而出宣布竞选后，让蓝营的支持者可能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

以目前的局面而言，蔡英文在2016年成为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可能性很大，那么这对于两岸关系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想必在短期内必然会受到影响，首要原因就是民进党的台独纲领以及不承认九二共识。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来是台海六十年来关系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两岸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突破，因此希望持有台独立场和不承认九二共识的领导人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大幅推进两岸关系似乎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而言，民进党的重新上台执政对于两岸关系走向一种成熟的状态也不乏积极地影响。台湾的政体是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主要特征就是执政党和领导人的轮替，因此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大陆无可回避地需要同时面对国民党政府亦或民进党政府。虽然可以预期如果蔡英文上台执政，初期对两岸关系一定会有不利影响，但也可以确信在当前的环境下，蔡英文即便希望，也很难像陈水扁当年一样在任上开展如去中国化，举行入联公投等一系列台独行动。

* 李帅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陈水扁担任台湾领导人之初对两岸关系曾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比喻，虽然在其任上我们是没有等来柳暗花明的时候，不过马英九上任这一时刻就来临了。而当马英九即将完成8年两个任期时，我们也会失望的发现，马英九在其第二任期已经对两岸关系难有新的作为，或者是因为不愿意，或者因为内部阻力过大，总之太阳花学运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在其第二任期的失败，甚至如今在台湾已经到了逢中必反或者讨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政治不正确。两岸关系未来良好地发展一定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取得最好的结果，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政府都应当基于民众的利益积极地表达出自身的观点和述求，这样才可能取得对双方来说最好的结果。

那么蔡英文上任后，会不会也有柳暗花明的时刻呢？显然我们不能轻易否认这种可能。马英九执政的八年时间，两岸关系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从其第二任期以来，似乎大家已经没有新的办法去取得新的进展。那么此时民进党上台执政反而可能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路？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选举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承诺，而台湾的经济发展需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需要和大陆的深化合作，这些问题就成了蔡英文绕不开的问题。虽然作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在太阳花学运中可以轻松地看国民党失去台湾年青一代的信任，然而一旦成为执政党，国民党面临的问题，民进党也会马上面临。就以服务贸易为例，显然蔡英文和民进党没有能力轻易地说不。总之，在当前的两岸关系中，蔡英文和民进党如果上台执政，他们没有可能对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那么既然要接触，那么也许就能为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找到一些新思路、新发展也并非不可能。

看完民进党和蔡英文之后，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洪秀柱和国民党可能继续赢得选举的可能性，而就目前最新的情况来看，国民党的也并非就是必败无疑。马英九执政的八年，对于国民党自身的影响可能有许多争议，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评判。如今马英九任期即将结束，并且在去年已经辞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马英九的任期虽然遏制了陈水扁去中国化的势头，但台湾对于中国的认同在不断减弱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对年青一代，这无疑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不利的。对于国民党而言，也需要有新的共识和承诺来获取台湾年青一代对国民党的支持，在这方面显然民进党已经领先了一步。洪秀柱如果最终能够代表国民党竞

选，可能对国民党是一个重塑共识与凝聚力的良好机会。首先，洪秀柱个人没有历史包袱，其家庭本来就是白色恐怖的受害人，民进党过去常常利用历史问题对国民党和其候选人攻击的手段可能对洪秀柱不太适用。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相比，洪秀柱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显赫的背景，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到了今天。最后来说，就是洪秀柱也许能够让国民党找回一些在马英九时代失去的共识和凝聚力以及更重要的是一些国民党的传统，最重要的是对一个中国的坚持。两岸未来的统一大业，一定需要国民党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最重要的力量。而马英九在其第二任期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担心来自绿营的反对，就不敢发出一个中国的声音。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的底线，同样也是国民党的原则，国民党在民主化的台湾需要适应民主政体而不断改变，但不论做出什么改变，历史决定了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能变，否则它也不再是中国国民党。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洪秀柱，即便选举失利，发出新的声音，展示新的行动对国民党而言也是重要的。

总的来说，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不能因为出现了太阳花学运这样的事件而失去信心，无论是国民党继续执政还是民进党赢得选举，我们都有理由期待两岸关系再一次柳暗花明。



（责任编辑：王志浩）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一场怎样的革命？

——由《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谈开

李括**

当 2011 年秋季，美国大陆能源公司创始人哈罗德·哈姆向奥巴马总统进言时，“他说石油和天然气界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可以为美国提供目前欧佩克提供给美国的石油。”¹但是据哈姆回忆说，总统似乎不太感兴趣，而是认为需要继续开发绿色和替代能源。然而，到了 2012 年 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地下蕴藏的天然气够美国用‘一百年’。”¹几个月间，一个国家的政策层面经历了如此突然又反差极大的变化，其背后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革？本文在对 2014 年出版的《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一书的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对美国所经历的“页岩气革命”在企业层面是如何被推动、其面临的竞争状况与政策环境及得以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一、页岩革命的背景及其推动先锋

1.页岩开采之初的能源行业背景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OPEC 宣布石油禁运，造成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1978 年，伊朗政治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一方面使得伊朗石油减产；另一方面，美国在伊石油企业均被逐出境外，致使国际原油再次短缺，油价大涨。随后的 1980 年，又爆发

* 本书英文原名为“*The Frackers*”，作者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Gregory·Zuckerman，原书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014 年出版。

** 李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 年，第 275 页。

了两伊战争，中东两大产油国几乎停止了原油出口，造成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就是因为这两次石油危机，能源问题才真正的成为了美国的一大难题。各种政策应接不暇，需要一个统一的部委来制定，能源部也就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因为天然气与美国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为拉拢选票，执政党当时都是对天然气价格实行管制。油价本来就很高，天然气价格又管制。这样一来，企业都倾向于将资源投入石油行业，而不是天然气。长此以往，天然气市场也出现了供应短缺。

“为了应对这一能源危机，美国政府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从政治角度上，美国政府用拉拢沙特、伊拉克等办法从内部瓦解国际石油垄断组织欧佩克。从政策角度说，美国开始鼓励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非常规天然气包括页岩气、致密气和煤层气)。”¹

“这是当时大的能源背景。正如上文所言，当时石油价格那么高，很明显，投资石油的边际收益要明显大于投资页岩气的边际收益。大石油公司都去全球各地勘探石油了，没有人愿意去冒险投资页岩气。”²而米歇尔能源就是 1980 年切入页岩气开发的。

2.不应被轻视为“中心企业”的“石油个体户”

(1) 起于草莽

“几个其貌不扬又野心勃勃、固执己见的石油个体户——就算有几个是有学历的，或者有些是有地质或开采方面背景的，他们怎么能够在巨型能源公司的嘴边猎取到这么大的能源储量？”³这是得知“页岩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由带有投机意味的“石油个体户”所推动的之后，人们所通常引起的首要疑惑之一；另一个疑惑则是，虽然“美国政府斥资 2 万亿美元用于洁净型替代能源，”⁴但其中分配给页岩产业用于新型压裂开采技术研发的份额却不到一半，“为什么这些私人企业仍能够改写美国能源发展的进程，而且……偏偏选中了化石能源？”⁵页岩革命的先锋企业家及其团队究竟如何在大型能源企业与政府的夹缝中处理两者间竞争与合作等诸多复杂关系，维持生存、发展并最终得以壮大？问题的答案似乎不应被“石

¹ 《页岩气革命在美国是如何爆发的？》，中国财经网，2013-07-16 05:29。

<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energy/fcgy/20130716/1640542.shtml>

² 同上。

³ 【美】Gregory 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 年，第 5 页。

⁴ 同上，第 5 页。

⁵ 同上，第 5 页。

油个体户”们表面上的“中小型企业”的规模所迷惑，而是应该找到其发展的可行性空间、市场上各层次竞争者的生存格局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与政策环境。

《页岩革命》一书中对于“石油个体户”这一称谓的解释是“远离能产油的油田独自开采石油或天然气的人。这些男人——没有女人——也是赌徒、推销员，也搞地质。他们极度自信，跟银行或投资人吹嘘他们的项目如何会在别人放弃、忽略或者出错的地方开采出石油或天然气。不管他们的机会多么渺茫，他们都会不断鼓吹，直到拿到合适的土地，然后开始钻井，等待石油或天然气被抽上地面。”¹这一群体最初并不被世人所重视，甚至在公众文化认知中找不到一席栖身之地。“在美国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剧《达拉斯》里的主角尤英和《王朝》里的布莱克·卡林顿这样屏幕上的石油大亨风度翩翩，吸引了无数观众，而现实生活中的石油个体户却频频碰到无油的岩层，狼狈至极。”²“在有‘能源重城’之称的城市，如达拉斯、休斯敦还有塔尔萨，那里的能源经纪人根本没有把哈姆（美国大陆能源公司创始人）在北达科他州干的事情放在眼里。”³“乔治·米切尔没想过要改造历史，他只不过想让公司苟延残喘。”⁴而他最初投身石油能源生产公司的激励也不外乎来自普通的追求成功与财富的青年们对豪华生活的正常向往。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石油个体户”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中小型企业”，也不是简单重复或粗放型经营的企业，他们初期已经掌握水平钻探或是尚不完善的液体压裂技术，而且无一例外都通过其他行业（如，运输、地产、投资中介等）的成功经营并积累了一笔客观的财富后，转而从页岩油气的开采。所以在基金与技术上虽然在入门时并不具备完善的条件，但石油个体户们也都具有相当的实力。

（2）新科技运用的成功典范

实际上业界公认的“页岩之父”乔治·米切尔并非压裂技术的最初发明者，“压裂岩石开采石油天然气的技术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被爱德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 年，第 32 页。

² 同上，第 10 页。

³ 同上，第 10 页。

⁴ 同上，第 14 页。

华·A·L·罗伯茨发现了。”¹米切尔只是改进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美国各个页岩区，但是，20世纪50年代时乔治·米切尔的很多竞争对手在他大力投入开采得克萨斯州怀斯县的地下岩层时却拒绝使用压裂法，原因在于当时使用压裂法的成本太高且钻探时间长。然而正是这种看上去笨拙而不明智的技术方法使得石油个体户在巨型能源企业止步的领域得以继续前进，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多么具有远见的超前之举。

油气资源行业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在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实证。美国的能源大户得克萨斯州在19世纪后期之前的钻探技术实际上是用来寻找水资源案的，例如“螺旋下钻技术”²。直到20世纪初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汽车、轮船等对石油的需求量大增，使得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展开了一场石油勘探大潮。而页岩油气开采领域的最好案例莫过于成也科技败也科技的奥利克斯能源公司，20世纪80年代，奥利克斯能源公司利用“短半径侧钻”的技术方法虽然与后来居于主流的水力压裂法迥然不同，但是却主要得益于当时电子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使得电脑成像以及地质分析技术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使得地下钻探更精确可行，也是的一些老旧油气井具备了重新开采的价值。随后这种技术被改进成为“倾斜角度钻探”，可以更好地适用于给传统垂直井带了重大困境的页岩层，因为页岩的油气回报层往往呈狭长而且浅薄的形态；但是随着奥利克斯能源公司的业务范围进军至巴尼特页岩区，由于该页岩区的岩石密度大于奥利克斯能源公司原先开采的奥斯汀乔克地区，而奥利克斯能源公司有没有掌握如米切尔能源公司的压裂技术，使得其在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次挣扎中最后失败而被科尔麦吉能源收购。

（3）大企业闻风进场

“1988—1992年间，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投资钻探与开采的资金是1500亿美元，比在境内多50%。这就说明了当时在美国境内的钻探开采投资额有多大，境外的投资是多么有利可图。”³直到1992年，美国全国石油委员会首次在其预测中将长期的天然气供应来源指向富含天然气的页岩层。而其后“在1996年，天然气的需求有所上升，价格也有所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22页。

² 同上，第43页。

³ 同上，第55页。

上涨，业界有广告标榜天然气是“洁净能源”¹。直到此时，一些大的能源公司如雪佛龙也开始考虑页岩开采问题，而这些大公司凭借其资金优势使其能够在对尚不成熟的技术调试中有更多的空间，所以很快便后来居上，甚至搭了石油个体户的便车。这种大企业反搭小企业便车的特殊现象的背后有其内在的原因，即雪佛龙这样的大型能源企业与石油个体户处于不同的食利层级，70年代到80年代油价高企，大型能源企业多在海外开采资源，而当时探明的国内储量寥寥无几，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石油个体户只能拾人牙慧，甚至在企业成立初期为了节省开采成本，主要租用大型企业早前开采过的旧油气井（但是当页岩层的油气开采出来之后，个体户们意识到这样做是明智的），基于上述原因，二者在面对并不十分确定的页岩领域的基本预期以及基于此的利害计算都有所不同。

1994到1997年，乔治·米切尔和最初支持进军页岩行业的雪佛龙高管雷·高尔文相继从各自的公司退出，第一代页岩开采先锋暂时退出了舞台。原班人马的调动也对石油个体户公司能够在大型能源公司环伺的情况下推动一场页岩盛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高尔文离开雪佛龙的原因在于初期并没有开采出令人满意的页岩天然气，使得雪佛龙高层失去了耐心而关停了高尔文负责的页岩项目，但其手下的勘探地质学家肯特·鲍克当时已经探明了巴尼特地区的巨大天然气储量并心有不甘，随后转战到了米切尔能源公司继续从事页岩气开采。这说明大型能源企业的国际市场格局使其具有广阔的食利空间，而其管理与运行的逻辑规则却更容易被短期的可预期利益所捆绑，而失去在页岩开采出去投入大量沉没成本并进行大量试验已收获长期但并不确定的利益的动机；在这一方面，石油个体户却由于缺乏回旋余地而从事专业化的页岩油气开采，反倒使其获得了大型企业视而不见的利益与生存发展的空间。

二、进入商业化开发阶段的页岩产业

1.石油个体户发迹的共同特点与命运

从早期的实业起家，赚的第一桶金后进军油气能源行业，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本，而当事业有了起色之后，石油个体户们往往倾向于转入具有社会性的事业（如城市规划建设、体育娱乐产业与设施、学校教育与慈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35页。

善基金、商业区等)或个人的奢侈消费。久而久之,这些除了油气企业本身存续发展之外,需要大量资金支撑的“支出项目”就会成为这些创始人们的刚性需求,与公司争夺财力资源,最终使企业背负上沉重的财政负担。20世纪70年代,“米切尔能源公司在休斯敦以北27英里处买下了15000英亩的土地,开始建造一座城市,来实现他逐渐形成的有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跟他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家坚决反对他的城市计划,认为那会分散他的精力,很可能把钱挥霍掉。”¹

2.经济形势与价格走势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与塑造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是在被美国能源业界成为“古拉格黑暗时代”²的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涉足页岩气开采的。最初的资本、人员规模与所有微型企业一样微乎其微,而且采取了跟随大公司的策略,在其他大钻探公司开采地区的边缘地带开发一些小的地块。整个八、九十年代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都低迷不振,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并没有获利空间,企业的维持要靠债务,这些最初的债务设定了该企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使其在1993年上市的时候还面临着债权人起诉司法纠纷,从而在法庭判决后令刚刚发行的股票一路下跌。1997年开始,国际经济发生了一些变化:亚洲陷入金融危机、国际油价继续下跌、OPEC组织的供给过剩。这些背景对油气行业的影响在于:低价使得开采业难以维系,但美国国内市场消费却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发电、燃气等能源消费行业取得了发展利好;另一方面,油价的长期低迷使得美国市场上逐渐形成了对其替代品——天然气的依赖,给了从事天然气业务的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生存下去的市场基础。

2003年,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花费5.3亿美元购进天然气资产,一跃成为全美第8大天然气生产商;两年后的2005年,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已经在美国7个州拥有80万英亩的土地,控制着7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全美行业排名升至第6位,但同时,公司的负债规模也涨到了55亿美元,大约是5年前的5倍;2006年,切萨皮克斥资43亿美元继续土地收购,公司债务推升至74亿美元。2007年,公司开始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公司高管奥布里·麦克伦登开始将融资目光转向华尔街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在真正的页岩油气的繁荣时期到来之前,正是华尔街的融资能力赋予了像麦克伦登这样的能源个体户认为能够改变美国,甚至世界的信心。正如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26页。

² 同上,第98页。

上文所言，切萨皮克在企业开始走向繁荣之际开始了公共体育场所、商业中心的开发以及高管个人凭借积累的财富进行地产投资。

2008年2月，当次贷市场已经崩盘的时候，一些投资者预期能源供应也已经见底，随即将油气价格都推向了高位，天然气价格达到了10美元/千立方英尺，而油价则在100美元以上。此时的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更是公职了1300万英亩的土地并预计开采36000口气井，企业的债务则达到了110亿美元。但是，2008年3月，“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金融体系可能崩溃的时候……混论局面对能源界没有什么影响，石油每桶几乎高达120美元。”¹这是切萨皮克又发现了两块页岩区，即马萨勒斯页岩（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北部和纽约州）和海恩斯维尔页岩（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和得克萨斯州东部），再加上之前的两块页岩区——位于南、北达科塔州和蒙大拿州的巴肯页岩以及北达科他州的费耶特维尔页岩，这四块区域的气田开采所需的全部资金大约为5000亿美元。²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还将马塞勒斯地区的天然气储量估算为“489万亿立方英尺，即全美20年天然气的用量”。³这些地区的良好表现也许是地产与金融在危机中崩溃时能源业依然坚挺的重要原因，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可以作为很好的证明，“7月2日那天，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股票最高时冲上73美元，而2008年初只有40美元。”⁴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报告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上升了8.5%，达到1.86万亿立方英尺，这是197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情况越来越明显，页岩不仅会改变公司，还可能改写美国的历史。”⁵麦克伦登认为“整个能源业都已经转型成功”。

当然，这样的繁荣不可能是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一家公司独立推动的。实际上，自21世纪初，国际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逐渐恢复，国际能源价格有所回暖，美国的页岩个体户基本形成以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大陆能源公司、EOG能源公司、谢尼埃能源公司以及收购了早前米切尔能源公司的德文能源公司、乔治·米切尔的儿子托德·米切尔创办的阿尔塔能源公司以及后来切萨皮克另外一位高管汤姆·沃德自立门户成立的桑德里奇能源公司等为主的格局。除了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之外，大陆能源公司、EOG能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209页。

² 同上，第211页。

³ 同上，第218页。

⁴ 同上，第212页。

⁵ 同上，第212页。

源公司和桑德里奇能源公司均认为天然气的价格在未来一定是越来越低，所以专注于页岩油和传统石油的开采；而谢尼埃能源公司则主要从事海外进口液化天然气在美国东南海岸港口的气化与销售。

但是，危机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好运气，能够像切萨皮克能源公司那样表现良好。原因在于，“石油的价格是根据全球的需求来定的。而天然气的价格只看美国的需求。”¹因此，对于专注于天然气开发业务的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来说，他们只要能够发现富含气源的页岩层并持续地开采出来保证产量，市场价格就可以使得公司的财务状况得以很好地维持，债务情况稳定，投资人的预期良好，公司的股票价格也能实现稳定上涨。但是，对于看衰天然气长期趋势而转投页岩油开采的大陆能源公司和由于区位优势而从事液化天然气进口及销售的谢尼埃能源公司来说，企业的产能与业绩与美国国内市场对其认可的相关度就没那么高了。前者代表了油、气两种资源之间的竞争矛盾，而后者则代表了生产与销售两个不同环节在某一价格通道中的损益关系。2008年4月，穆迪投资公司因谢尼埃能源公司计划兴建气化厂而重新举债的缘故，降低了该公司的债务评级，导致投资者抛售谢尼埃资产，造成了股价36%的单日跌幅，从10美元跌倒了7美元多，两个月后甚至跌破了3美元，²而且这一价格一直持续了两年左右，“很多投资者都把他们的股票当坏账给处理了”，³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从2008年至2010年经历了一倍多的增长，从2.25万亿立方英尺，增至4.86以立方英尺，⁴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这类公司的良好业绩。而勘探开采实业运作良好的大陆能源公司与丧德里奇能源公司也同样难以抵挡危机中能源价格的“气跌油涨”所造成的股价狂跌。桑德里奇能源公司2007年上市时股票为32美元一股，虽然2008年曾一度涨至68美元，而至2012年每股仅剩6美元，“但是公司每季度的收入都超标，堪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密西西比油田打出的油量惊人。”⁵面对如此的经济形势和价格状况，谢尼埃能源公司在2010年宣布由液化天然气进口业务转而从事美国国内天然气的液化出口，并且拿到了能源部的出口批准。页岩天然气的产量与价格对企业发展形态的塑造与影响由此可见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241页。

² 同上，第2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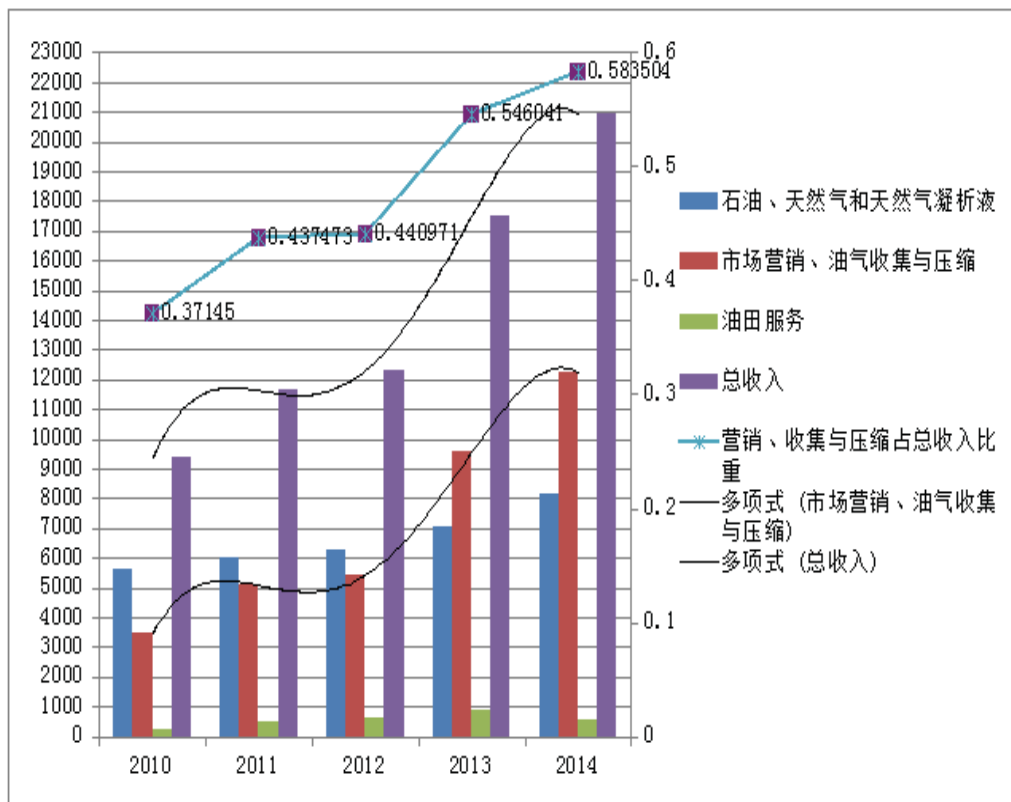
³ 同上，第265页。

⁴ 同上，第215页。

⁵ 同上，第2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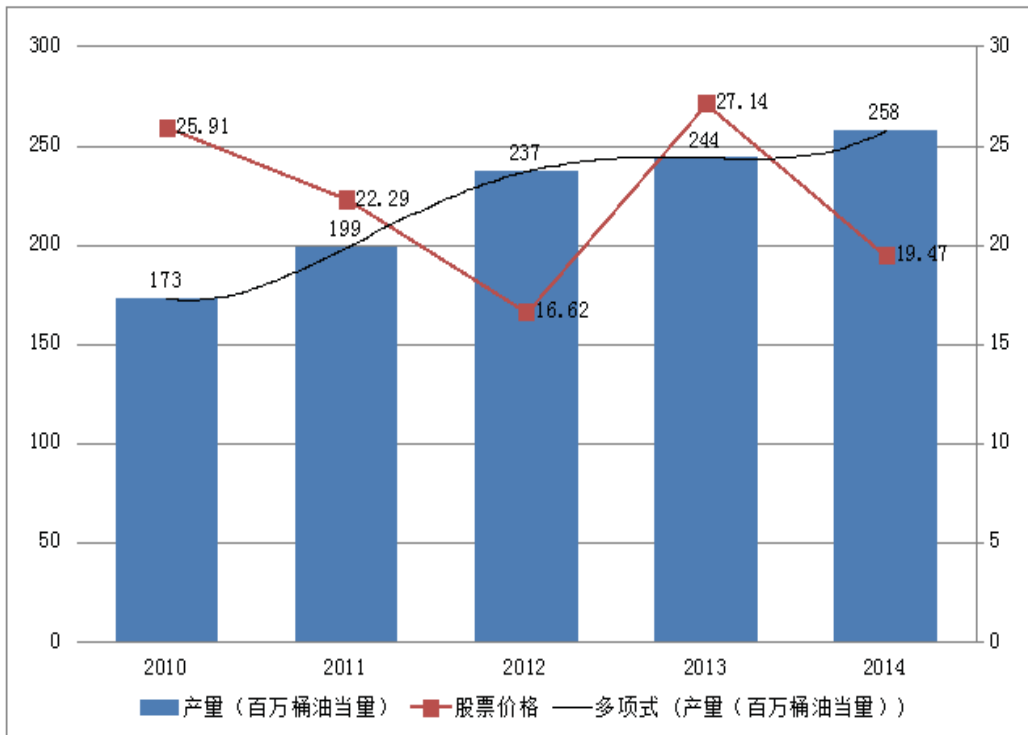
一斑。

2012 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是 8 万亿立方英尺，而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生产了 1.1 万亿立方英尺，约占 1/8；而 2008 年美国天然气产量虽然只有 2 万亿立方英尺，但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产量为 7750 亿立方英尺，约占 1/3。总产量增长了十多倍而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所占比例却大幅下降，从侧面反映了页岩气行业中其他企业的数量及产量的迅猛增长。图一是切萨皮克能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了当前该公司的发展特点：公司总收入的折线走势基本与市场营销资源采集加工环节的收入折线走势相吻合，而油田服务于资源开采环节基本稳定，体现了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策略的重点所在。而图二中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年产量与公司股价的走势则呈现反向趋势，即 2010-2012 年产量平稳增长时，股价则平稳下行；2012-2013 年产量增速放缓时则股价反升；而 2013-2014 年加速增产后股价又开始下滑。其原因似乎在于 2011 年后，公司内部股东对于高管麦克伦登的管理运营模式日渐不满有关，加之当时气价持续低位运行，而公司由于土地租约原因却被迫在成本收益计算亏损的情况下继续开采，导致投资人预期与公司产量呈反比关系。



图一.克能源公司财政数据

数据来源：切萨皮克能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单位：百万美元）。



图二. 2010 年-2014 年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产量与股价数据

数据来源：切萨皮克能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在切萨皮克,我们的人专注于性能。从提升创新的解决方案演示操作和金融领导以及资本效率,我们的员工每天都为我们的股东创造持久的价值。”这段话译自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官方网站上关于企业宗旨的表述,也是当前公司将经营重点放在了维护公司资产运行与股东利益方面,而并没有强调在能源开采、生产加工环节上的投入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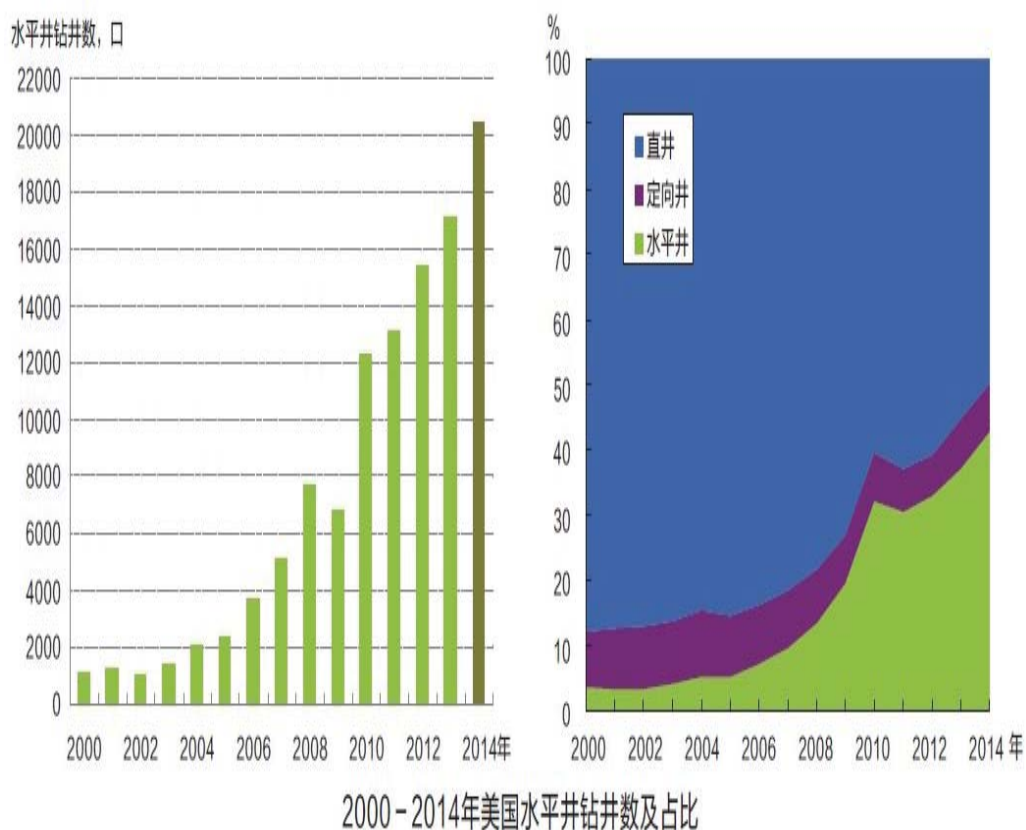
3.当前美国页岩油行业的新发展

“致密油开发成为新热点,油井钻井数重新超过气井,因致密气、煤层气和页岩气的开发,美国气井钻井数从 1993 年起超过油井。但随着致密油的大开发,美国油井钻井数从 2010 年起重新超过气井,2013 年油井钻井数增至 32500 口,远远超过当年的气井钻井数(7900 口),另钻干井 5600 口。使得美国的致密油产量从 2008 年的大约 2000 万吨激增至 2014 年的 1.6 亿吨以上,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¹

“因页岩油气的大开发,水平井钻井工作量远超直井随着页岩油气的

¹ 杨金华、何艳青、郭晓霞,《美国钻井业市场新趋势和启示》,金银岛,2014-11-04 08:58:06. <http://news.315.com.cn/20141104/100146424.html#top>.

大开发，美国水平井钻井数、进尺及其占比快速增长。2013年，美国钻水平井增至 17100 口，钻定向井 3500 口，直井 25400 口，水平井钻井数的占比升至 37%；预计 2014 年水平井钻井数将首次突破 20000 口。2013 年有 1102 台在用旋转钻机钻水平井，占在用旋转钻机总数的 62.5%。”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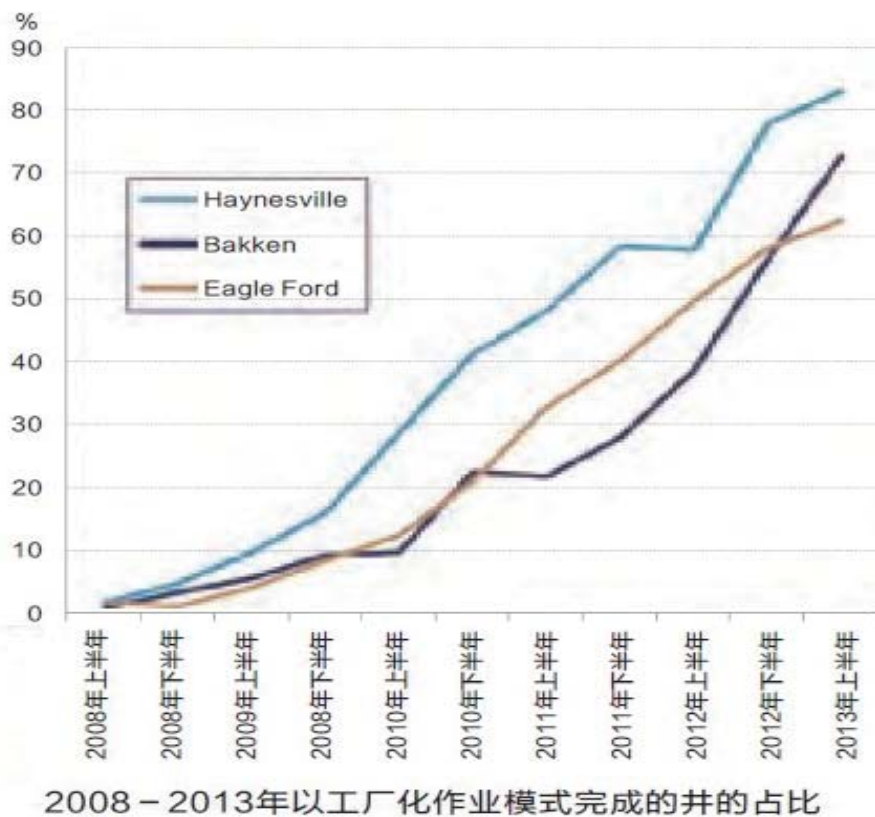
图三. 2000 年-2014 美国水平井钻井数及占比

图片来源：转引自杨金华、何艳青、郭晓霞著《美国钻井业市场新趋势和启示》，原载金银岛 2014-11-04 <http://news.315.com.cn/20141104/100146424.html#top>.

“在各大页岩油气产区，工厂化作业日益盛行。近些年，用工厂化作业模式完成的井的占比快速增长，现已超过 70%，个别产区达到 90% 以上。工厂化作业在美国页岩油气大开发中日益盛行，催生了一种新型钻机——工厂化作业钻机，即井间快速移动钻机。”²

¹ 杨金华、何艳青、郭晓霞，《美国钻井业市场新趋势和启示》，金银岛，2014-11-04 08:58:06. <http://news.315.com.cn/20141104/100146424.html#top>.

² 同上。



图四. 2008年-2013年以工厂作业模式完成的井的占比

图片来源：转引自杨金华、何艳青、郭晓霞著《美国钻井业市场新趋势和启示》，原载金银岛 2014-11-04 <http://news.315.com.cn/20141104/100146424.html#top>.

4. “革命”能够成功的独特原因

当前国内外都不乏唱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评论文章与著作，也将美国社会缺乏革新的创造力作为批判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承认个人追逐利益的商品市场经济模式依然能够不断激发人们的创造，这种经济制度构成了一次次产业技术革新的基本土壤。诚然，今有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还远远不够，页岩革命的相当重要且比之于其他拥有天然页岩油气禀赋国家的绝对独特之处就在于美国从联邦到州县地方的土地法律政策的激励环境。“在美国，如果有人买了房子，那么房子下面的土地也算是他的，这跟很多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石油个体户可以不通过政府就直接跟房产主人联系，购买他们的石油开采权。”¹

“1980年，美国政府启用了一种新税法，叫‘非传统性燃料税信用额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129页。

度’，也就是‘29条’。启用这条税法是由于美国担心对进口石油依赖过多，旨在刺激从页岩或者其他难度较大的岩石，如煤层里进行开采。”¹这也是乔治·米切尔时代投入页岩油气开采的最初的政策激励。而“(土地的)强迫租用是合法的——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规定，土地的业主可以自己钻探，也可以把土地租给他人钻探以开采石油或天然气。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业主可以自己不开采，但他不能阻止别人租用他的土地。这是很多州都采取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杜绝那些阻碍能源开采的钉子户。这种做法类似于政府征用土地。”²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成为页岩油气两大巨头的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与大陆能源公司均发迹于俄克拉荷马州的重要原因。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有一度曾在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的美国南部甚至全国各地供养着进5000名土地交易员来进行廉价土地收购，从而为后来的产能爆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土地政策也并非全部有利于页岩行业的公司。2011年以后，随着美国国内页岩天然气产量的增加，而且连续两个暖冬，使得天然气价格跌破了3美元，2012年更是跌至2.5美元，为12年来最低价。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海恩斯维尔的开采成本在3.5美元左右，而在巴尼特地区则需要4.5美元左右。然而公司仍然进行着不间断的钻探，并非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而是害怕失去土地租约，从而丧失产能。“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及其竞争对手公司跟业主签约的时候，合同里都有‘开工时效’的条款。也就是说，他们在租下土地之后，必须在3~5年内开工，并且业主可以根据产量提成，要不然他们的合约就可能失效。……一旦钻探开始，业主可能获得的产量提成可能是油气井15%~20%的收益。”³“开工时效”这一重要的行业契约惯例的重要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在气价低谷时仍然不断开采。相关资源的制度性规则与企业的沉没成本逼迫其在市场逆境中推进生产，这一方面急剧加速了美国页岩气产量的整体攀升，另一方面对于个体的企业而言，这种绑定的效果使其难以放慢节奏从而对企业资产与财务状况进行定期合理调整，也使得企业越来越依赖融资、扩展地盘、举债的循环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构成了页岩油气企业产量与能源价格的螺旋曲线上实现拐点的潜层因素。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100页。

² 同上，第94页。

³ 同上，第269页。

三、结论：是革命还是泡沫？

新华网转载《中国经济周刊》一篇名为《页岩气：能源革命还是资本骗局？》的文章称：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这都是一个有争议的技术。”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米歇尔并不糊涂。这项技术至今仍留给世人很多疑问：它会消耗大量水资源？它带来美国“小震不断”？它的成本是不是太高？……更大的质疑认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其实是骗局，有外国专家在科学期刊上发文指出，在运作的第一年，页岩气井的产量下降了60%~90%之多。

2004—2009年，美国页岩气的年增速达到40%以上，并以每年几百亿立方米的增量井喷。2012年，美国页岩气占天然气总量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1%上升到37%，达到2653亿立方米，几乎是整个中国天然气的年消费量（约1500亿立方米）的两倍。¹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还想把在马塞勒斯32.5%的股权卖给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来筹集34亿美元的资金。……那个时候华尔街已经濒临死亡，所以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交易。但是，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全球的大能源公司开始相信页岩革命是真的。”²

页岩革命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争议而发展。如果其能够被称之为场源自美国的世界能源格局的变革，那么这场变革是否足以改变美国国家的禀赋类型，从而赋予美国重新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定位的深层可能？首先，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两处气田，最近五年，天然气产量又增长了20%。这对美国对外能源贸易结构与贸易对象国的选择上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可以仅从友邦邻国进口所需能源及其产品，而不必依赖中东地区一些在国家利益上与美国相悖的国家，这种依赖关系的调整将进一步导致国际能源体系中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深刻演变。第二，天然气价格从2008年以来跌了75%，由此导致的生活及生产成本与物价的调整，将使得产品结构、生活成本受到全球油价以及国家战略权力结构要素的影响。第三，书中预计到2020年，美国的能源行业可以创造出2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或可抵消2008年次贷危机中房地产泡沫破裂时

¹ 《页岩气：能源革命还是资本骗局？》

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3-08/19/c_125200391.htm

²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224页。

造成的失业损失。尤其是在俄亥俄州、怀俄明州、西弗吉尼亚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等页岩分布广泛的地区，油气的勘探与开采拉动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就业，北达科他州失业率已下降至3%。第四，“一股‘重新回归’的热潮已经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产业——钢铁、化学制品、化肥、塑料、轮胎以及其他各类公司，纷纷把生产厂房转回美国或者扩大在美国的厂房，外国公司也开始在美国设厂。这样的举措将以前大家认为被中国和其他廉价经济体永远夺走的就业机会抢了回来。”¹对于企业而言，由于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降低，将强化美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环节，从而影响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地位。第五，新发现的丰富油气资源很可能使美元再次坚挺，从而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而且可以进一步减少以往为了维护能源进口来源渠道安全所部署的国防军事力量的费用，而把某些区域的安全责任交给其他利益联系更紧密的国家，如中国。最后，从第一代页岩“先锋”乔治·米歇尔晚年与加拿大相关能源公司合作，到谢尼埃能源公司在墨西哥湾与法国、墨西哥企业的合作，说明页岩革命从技术、业务等方面开始向美国之外传播，未来可能将在全球各地有需求、有能力的国家引起广泛的科技变革。

另外，《页岩革命》一书中关于石油、天然气资源形成原理的介绍似乎对在地质学的空间与时间这一更基本的层面上理解页岩革命有所助益：

“底下的热度会把其他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推向地表，就像油在热汤里会浮到表面一样，直到碰到近地表的岩层……业界一些人士把页岩称作‘基础岩石’，因为它是大多数在地表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基地。就像在厨房里烹煮的食物，煮好之后送上餐桌一样，地底的页岩经过了热度和压力的长期作用，里面的石油和天然气被‘煮熟’，慢慢被推送到近地表的油床和气床中。”²

“不过，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还是被锁在地下的页岩里。但是，很多地质学家都不主张去直接开采页岩来获取里面的能源，因为这些通常为黑色的页岩坚硬无比。但是，饥饿的年轻人没有耐心在餐桌前等待，他们会直接冲到厨房里找东西吃。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人也一样，他们没时间等石油天然气慢慢浮上地表，他们更喜欢直接开采。”³

¹ 【美】Gregory·Zuckerman，《页岩革命——新能源亿万富豪背后的惊人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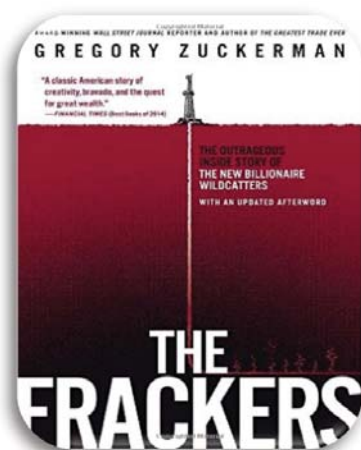
² 同上，第29页。

³ 同上，第29页。

由此可知传统油气资源来自深层的页岩层的能源储量长期向地表输送的结果，而页岩油气的开采则意味着越过页岩层以上的地质空间与长期的从页岩层向地表的运送周期，直接向源头处开采未来的油气资源。

然而这场所谓的“革命”与政治历史领域的其他革命一样，并不具有普世传播的必要条件。乔治·米切尔晚年也曾与加拿大的能源企业进行了页岩开采领域的合作，但北美洲的地质条件乃至附着在其土地上的人口密度、社会经济状况、基础设施网络、水资源的丰富程度等本文中未作重点分析、但构成了促进美国页岩革命成功的众多要素，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并不一定具备，例如中国预计有全球最丰富的页岩油气储量，但富集地区位于国土西南，地质构造脆弱，同时缺乏水资源；俄罗斯则尚得益于传统油气，而不具备短期内开发页岩的社会经济激励；墨西哥同样缺乏水资源；欧洲则面临基建不完善与人口密度大、技术欠成熟的阻碍。正如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一书中对于一种经济的性质的论述，“……把经济看成是由强大的行为者组成的一种明显的社会政治结构”¹，而“市场扎根于较大的社会政治体系中……”²才能够正确的理解页岩革命为何在美国得以成功，以及能否并且怎样在其他国家与地区开展的持久命题。毕竟即使对于美国而言，页岩革命的开始也仅仅经历了 30 年左右的时间，远不足以为这一可能对美国甚至世界能源供需结构造成影响的技术乃至产业做一个确切的定论。

（责任编辑：杨静）



¹ 【美】Robert·Gilpin,《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06，第 33 页。

² 同上，第 35 页。

以华夏观华夏：重拾先秦古典思想

在中国崛起中的价值

——《华夏主义》书评

张家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各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崛起的分析与预测十分热衷，与此同时，国内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的崛起迫切需要能被广泛接受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支持。叶自成教授的《华夏主义》一书是对构建当代中国本土政治思想的有益尝试，以中国先秦五百年（公元前 721 年—公元前 221 年）的历史经验和诸子百家典籍为依托，总结归纳出了以易经思维为基础，以老子范式、孔子范式和商子范式为主体的华夏主义思想。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在世界体系未形成以前，除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以外，最符合现代国际体系标准的即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华夏体系。在叶自成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崛起——华夏体系 500 年大历史》中，详细探讨和研究了先秦华夏体系 500 年（公元前 721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的产生、发展及兴衰的历史。《华夏主义》与《中国崛起》互为表里，互相依托，对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易经》、《道德经》、《论语》等进行全新解读，对老子、孔子、商鞅及管子四大政治范式的主要内容及特点进行梳理、概括及总结，并考察它们在魏、楚、齐等大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重点在于追根溯源，并科学、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为中国崛起寻找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基础。作者由对中国崛起的理论解释的探讨入手，先批判了西方主流理论范式的缺陷及其遭遇华夏体系和中国国情时的“水土不服”，继而根据先秦诸子经典中的理论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崛起的具体历史事实，提出华夏主义范式的建构，主要论述了《易经》的整体、变化、阴阳、中和四大思维；道法自然，顺势而为的老子范式；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才主义的孔子范式；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商子范式；以及儒道法三家合一的管子范式。

一、解读华夏主义：老子、孔子、商子、管子四大范式

* 张家铭，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老子范式的核心是“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里的“道”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宇宙和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的根本要素和运行的基本法则，在政治中表现为无为而治，而“势”是依道而行、以道治国的各种主客观要素的综合具体体现，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物质与精神、国内国际环境等。¹老子观察一切问题的方法和出发点，就是以自然理性来指导人类的社会理性，总的来说，就是尊重自然、享受自然、顺应自然，人类社会要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并效法自然之道来治理人类社会。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道，行“无为而治”。无为政治具体体现为四种精神：第一，给社会和个人充分自由的自由精神，表现为积极倡导社会与个人的“四自”精神，就是自化、自富、自朴、自正。第二，“抑举损补”的公平和正义精神，就是说当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时，就要采取措施损有余而补不足，使“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而不是听任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第三，以百姓心为心的善治、爱民政治及政治评价标准。第四，宽容之心与多元主义，无为政治的社会，人们以宽容之心互处。老子思想对华夏体系中的越国、魏国、齐国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的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辉煌时期，几乎都出现在道家思想占主导的时期。

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华夏主义》不赞成“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文化传统实惟孔子一人”的观点²。《华夏主义》认为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其政治主张在华夏体系时期是失败的，其失败表现在“治国不以法，而以其智和礼”³；而在汉以后对儒家的独尊反而使其被曲解，其核心精神被破坏。孔子范式的核心概念归结于一个字，就是“人”，他的思想是“仁道”，其基本思想和结论，就是以人为本，以人治国，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才主义出发治国平天下。孔子的人本主义是指国家和人类社会以人为本，本着人是一切事情根本出发点、归结点来处理一切社会问题，而不是以神明、上天、天子、君主、资本、权力、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中的民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人文主义，主张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理性的统一，人不仅是有理性的动物，而且是有情有义的生命体。人道主义，是指本着人之为本义，来处理人对人的因应之道。人才主义，核心是教育，倡导君子精神，主张人都应通过修身养性成为有德行的君子，而君子应当为士，应当从政，应当在政治生活中贯彻仁者爱人的仁道精神，己立立人，已达达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治国的思想。

商子范式的核心概念可以归结于法治，其基本思想和结论，就是以力

¹ 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81 页。

² 同上，第 510 页。

³ 同上，第 195 页。

争利，良好的国家法律制度是最强大的国家实力。这里的法治不是简单的法学意义上的法，也不单是国内政治中的法，而是指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因素在内的综合因素，它的首要目标是争取在国家间政治的强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是紧密不可分的，甚至国家间政治的目标高于国内政治的目标，国家的霸权是更根本的目标，国家长治久安是达到争取国家霸权的一个条件。因此，商鞅的法治范式不仅是国内政治的范式，也是国家间政治的范式。¹法家则对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和富国强兵高度重视，强调以法治国，正好弥补了儒家思想的重大缺陷，形成了华夏体系中的大国崛起的新范式。商鞅变法的根本内容是鼓励农耕与军功，以农为国本，农战结合，富国强兵。商鞅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加国家的经济力量，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治理国家就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国就是所有人按法办事，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商鞅主张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权力高度集中与法律规范下的地方和民众自治并行。以法治国在思想本质上是反对个人集权、反专断、反暴政、反专制的。后来的秦始皇的个人专断、秦朝暴政与秦的短命，正是违背以法治国精神的恶果。²商鞅所代表的法家学说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套真正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在西方直到公元前 16 世纪才出现。商鞅具有非道德主义倾向，是世界上最先使政治理论摆脱道德的学派，也是中国政治学比较发达的标志之一。³

以上所述的老子、孔子、商子范式，分别强调道治、人治和法治，而在实践中，道、德、法实际上经常混合在一起，尤其是作为中华万经之源和百家之根的易经思维特别强调整体综合思维。《华夏主义》认为，由于管仲时的齐国是春秋首霸，对各家都有影响，也得到各家的肯定，《管子》一书实际上是各家学说的精华，因而以管子为代表将道、儒、法一体的范式成为“管子范式”。⁴管子范式以易经思维的整体综合思维为方法论，核心概念强调一个“合”字，把道家的“道”、政治上的无为而治，把儒家的“德”、政治上的君子人才主义，把法家的法治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管仲相齐期间将其思想理论付诸了实践，管子的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模式”、盟会与华夏秩序的管子霸权论、管子关于国家综合实力的论述、管子礼治法治结合、管子以民为本富国富民的治国思想、管子“不结盟不动武善与邻管好边”的对外关系原则、管子的对外开放思想以及商战和货币战思想

¹ 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54 页。

² 同上，第 404 页。

³ 张分田：《秦始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4、483~484 页。

⁴ 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13 页。

等，不仅改变了齐国，改变了春秋历史，其很多超前思想在今天看来都很先进。管子范式对齐国、魏国的崛起以及汉初文景之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思想上催生了荀子对诸子百家的批判与综合，并在汉初形成了儒法道合的陆贾主义。《华夏主义》认为，陆贾即是老子后最有成就的道家，也是孔子后最有成就的儒家，而非董仲舒。陆贾的《新语》找到了孔子思想中合理的新宿并将其付诸实践，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天灾论、君主天命论等则大大背离了孔子以道事君、君心民体、民本思想，是“孔子思想最大的修正主义者”¹。《华夏主义》对董仲舒及其之后两千多年的儒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汉以后对儒学的独尊与修正造成了华夏主义精神的消失，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华夏体系时期百家争鸣的景象，中国在思想文化、政治、以法治国、军事外交、人格魄力、方法论等多方面都出现了大倒退。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一百多年来众多中国人还在西方学说思想中寻找当代中国面临问题的答案。

二、对“以西方观华夏”的批判

本书的作者叶自成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78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是地道的国际政治专业科班出身，而国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学科则是一门地道的西方学科，历史必言自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理论必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西方几大流派，而在本书开篇以及结尾都批判了当今国内外国际关系界“言必西方”、特别是套用西方理论与历史来观察中国的现象。作者并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关于“范式”的解释上作者认同了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定义：“范式用来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的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²但是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理论的最流行的美国国际关系三大范式，即以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范式、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以及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范式，作者不仅指出了它们所固有的理论缺陷以及在解释诸如苏联解体等现实事件上的局限，更指出了三大范式在遭遇华夏体系历史时的失灵。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体系是一个有权威的等级明显的无政府结构，区别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所说的平行的国际无政府结构。在很多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如管仲时的齐国、

¹ 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2页。

² 同上，第3页。

晋文公时的晋国、魏文侯时的魏国等，都没有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均势政治的影子。特别是最后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则完全难以用新现实主义均势逻辑来解释。而华夏体系中国际机制和秩序的形成有赖于某些国家的意愿或个别统治者的才能，即使形成后也并不使战争减少合作增加，而比华夏国家间合作更多的情况是华夏国家与夷狄国家勾结对付另一个华夏国家，华夏国家的共同身份并没有建构出华夏国家的共同利益，由此看来华夏国际体系也无法完全用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来解释。

在探讨当代中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时，中国的学界与媒体也几乎都在西方的历史中找答案，央视还曾经拍摄过一套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介绍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崛起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启发。外国学者也时常拿西方历史上的国家发展来套用预测当今中国，将中国和威廉德国类比，或者将中美关系和一战前德英关系类比在国际上很有市场。不仅在国际关系上，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解读和预测上西方理论视角也是占主流的，在国外，西方学者与媒体倾向于用自由主义来观测中国，在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下中国被描绘成一个专制独裁国家，“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而在国内，源于西方的两大思想理论体系在激烈的争夺意识形态高地，即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权价值体系，与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其在中国的争论引起了巨大分歧，并有可能引起思想界的分裂。¹ 在国家政治上，《华夏主义》的态度很明确：西方式民主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是认为西方民主是导致西方强大富强文明的制度原因的理解误区，西方民主还远没有被最终证明是人类有过的最好政治文明，导致国家强大富裕文明的原因也有多种，不能单一归于一种制度；其二，误以为西方民主是有文明以来最不坏的制度，因而相对于其他制度它也是最好的，但其存在无法制约“资本”，无法保证领导人质量等根本有违民主初衷的多种局限；其三，西方政治文明是基督教、法制、民主选举三位一体，缺乏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支撑西方政治文明。² 西方式的民主也仅仅是多种政治文明中的一种政体，应该看到民主理论和制度自身的问题，对其不应盲目崇拜。《华夏主义》书中一前一后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西方国家政治理论的批判，虽然在篇幅上不是重点，但在笔者看来，却是最具有启发性的部分，只有跳出“以西方观华夏”的思维局限，认识“以华夏观华夏”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才能更好的去发掘和探讨中国华夏体系历史经验和华夏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¹ 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02 页。

² 同上，第 519 页至第 536 页。

三、中国需要“李克思”

《华夏主义》将先秦古典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法家等几大流派的思想以易经的综合思维进行融会贯通，即将其中符合现代文明的思想精华进行了提炼，又批判了古人思想中的缺陷与落后于时代的局限，将老子范式、孔子范式、商子范式以易经思维为方法论综合成为“华夏主义”，并大胆的提出了中国不仅需要马克思，还需要“李克思”（LiKS）——即老子（李耳）、孔子、商子姓名拼音首字母（Li-Kong-Shang）的合写，“李克思”思想就是华夏主义。¹叶自成认为，华夏主义可以为当下中国提供有效的历史事件经验，提供最先进的普世价值，华夏主义蕴含的公正、均富、平等、和谐、中庸、自然等价值观总体上高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华夏主义也提供一个更理性的历史观，叶自成反对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概念为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盖棺定性。华夏主义也有助于帮助中国跳出西方式的非 A 即 B 的思维藩篱，解放思想，还可以为当下中国提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思想。可以说，《华夏主义》一书对中国自身历史和古典文化充满了崇敬与自信。

而近年来，中国历史和古典政治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他高度概括我国历史上的治国方略，指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古代治国立政思想，“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²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有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³。尽管《华夏主义》内容中在对老子、孔子、商子思想的理论解读上尚有些地方说服力不强，而且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化，“华夏主义”本身也是其中的一家之言，但其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古典文化不能再继续无知下去了。笔者期望叶自成教授的《华夏主义》能够激发起中国民间和学术界对古典文化更多更激烈的讨论与发掘，不仅仅是儒法道三家的思想，

¹ 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4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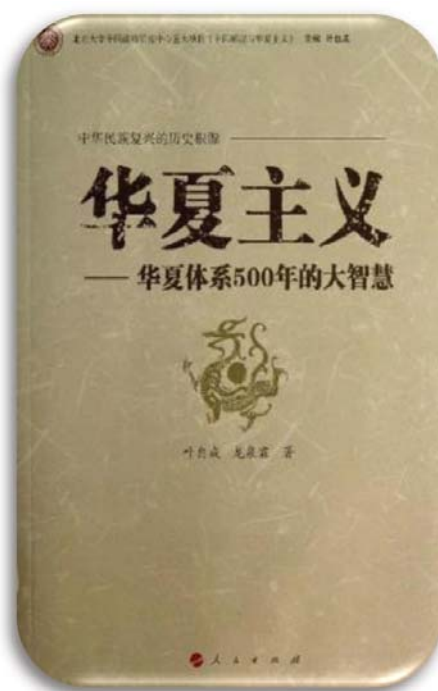
² 周国林、张祥干：《珍视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载《光明日报》2015 年 1 月 26 日 16 版。

³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总序》，第 3 页

闻道

还有墨家、兵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等待发掘和发扬，使其现代化、大众化、革新化、政治化，真正成为中国软实力和
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历史资源。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需要东西方各类思想
文化同台竞争的“百家争鸣”，需要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

（责任编辑：刘娅楠）



行万里路

[编者按]世界形势波云诡谲，青年学子共同担当。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向来以培养有理想敢担当的人才为目标，国关学子也以成为有知识储备，有国际视野，有责任心的有志青年为己任。这个夏天，我院学子穿梭于国内外多个暑期学校，学知识，长见识，与全球青年才俊聚焦热点问题，共叙国际时事。本期《闻道》开辟专题——“行万里路”，来记录下这些来自俄罗斯、法国、土耳其和中国的精彩瞬间。

印象莫斯科

王韵涵*

七月初，我们一行十五人来到莫斯科交流访问。短短十日太少，无法看清这座城市的模样，甚至无法摸清它的主要脉络。十天时间的相处，说理解太难，不如说印象。

印象派总是“致力于捕捉模糊不清的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印象主义者更是关注“这种瞬间感觉经验如何转化为感情状态”。从这个层面而言，我也是一名印象主义者，在乎“转瞬即逝的感觉”和随之而生的“情感状态”。

如果我和莫斯科之间的十天可以算作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就毫无疑问是一段“印象史”。印象和情感在每一个触发点被触发，然后，这种印象和情感便随之形成，并永远的附着在它们诞生的地方。

莫斯科的云

在最值得莫斯科人骄傲的事中，一定有他们的梦幻般的云彩。走出机场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唯有亲眼所见，才能真正理解了那些来自俄国的油画中所描绘的云朵的模样。如果莫斯科是一个坏孩子，那么莫斯科的云就是护佑这个孩子健康成长，任由其放肆的理由。

这些云就像是迷了路的精灵，反而因为眷恋这里的蓝天而住下了，

* 王韵涵，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蓝天白云相得益彰。

千顶之城

背向莫斯科大学的巨大主楼，一路向东，走到莫斯科最高处麻雀山的观景台，眼下就流淌着莫斯科河。坐西南而远眺东北，视线穿过整个莫斯科的核心地带。郁郁葱葱的城市里，无数教堂的尖顶耸立于其中。刹那间，故事里的“千顶之城”就笼罩在你的眼前。

众多莫斯科的别称中，我最喜欢“千顶之城”。另有诸如“五海之港”之类太宏大，我感受不到。里海只不过是类似海洋生态系统的咸水湖罢了，即便是波罗的海、白海、黑海或亚速海也皆为内陆海。事实上，直至1937年莫斯科运河竣工后，莫斯科才得以连通里海。所以，“五海之港”太空，也不接近莫斯科的城市灵魂。莫斯科离海真的太远了，“海港”只不过是莫斯科人美好的梦想。



阿尔巴特街

阿尔巴特街不同于红场。也许是了解的太多，在亲身接触红场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触。广场无非是广场罢了。

不过，每座城市都必然有触动你心灵的地方。阿尔巴特街的美妙就在我毫无防备和期待时毫无顾忌地成为了这样的地方。从此，莫斯科和阿尔巴特街便无法分离。而且，对我而言，阿尔巴特街更能够代表情感世界里的莫斯科。

依稀记得那个凉爽的午后，我们漫步在充满欧洲文艺气息的阿尔巴特街。或许是因为对音乐格外敏感的缘故，我印象中的阿尔巴特街是被音乐占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家们在那里演绎自己热爱的音乐。无论是古典或流行，或是少有耳闻的哥特式灵魂乐，都似乎在向我传达着“欧洲”的情怀。莫斯科的一切美好就在那一刹那如同一杯温热的 Espresso，将所有浓缩的精华涌入我的口中，回味无穷。也就在那一瞬间，我似乎理解了莫斯科，理解了俄罗斯，也似乎理解了圣彼得堡和遥远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



双头鹰

印象中，俄罗斯总是游走在欧洲的边缘。十天的相处让我相信，莫斯科是属于欧洲的。尽管城市的主要风貌都已被苏联时期的建筑所覆盖，但是那种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体验显然更是继承了欧洲的精神。至少，它始终在发自内心地努力证明这里就是欧洲。

在我看来，俄罗斯的双头鹰中，朝向西方的那只代表了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欧洲部分；而另外一只朝向东方的则是指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然而，这本身就是讽刺的。一只鸟怎么会有两只头？是否这双头鹰本身就暗含着俄罗斯国家所面临的难以同一的问题？俄罗斯是莫斯科的俄罗斯，而非西伯利亚及远东的俄罗斯；莫斯科也象征着属于欧洲的俄罗斯；圣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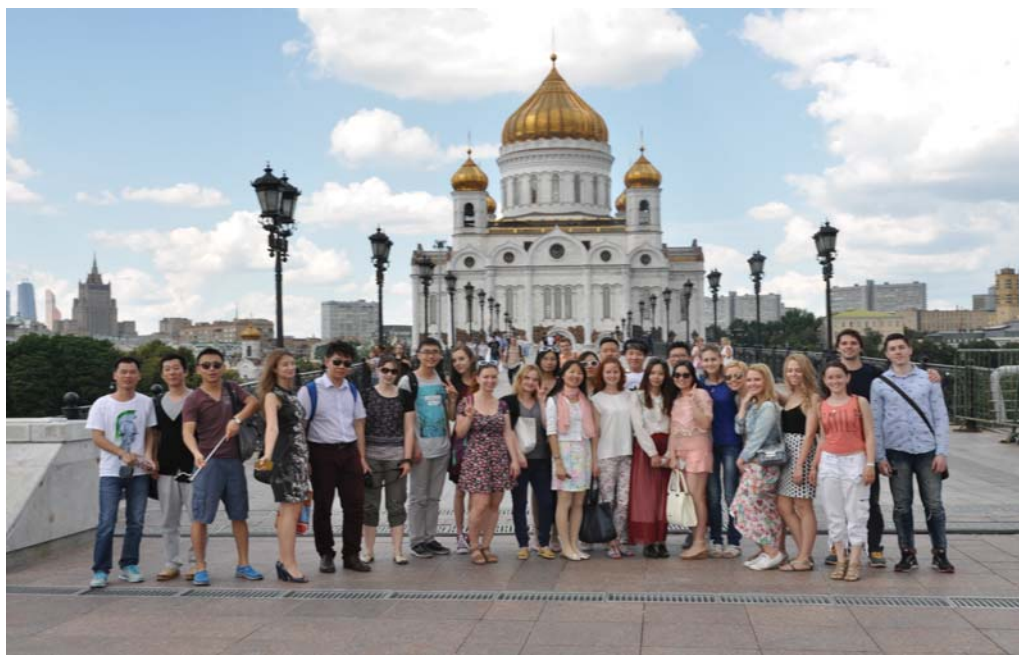
堡则仅仅是整个俄罗斯在欧洲的幻影罢了。至于西伯利亚及远东，它们属于俄罗斯却不归属莫斯科灵魂下的俄罗斯。

作为罗马帝国东正教的真正继承者，俄国人太迷恋欧洲这块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可是，在西向的路上，西伯利亚和远东就像是一个巨大而又笨重的尾巴拖住了前行的脚步。俄国人不愿舍弃这片土地而又为之烦恼。因此，双头鹰出现了。不过，这双头鹰的两只头中朝西的大而东向的小。正如一位俄国朋友所说的那样，东面那片广袤的疆土被无情的低估了。

结语

印象派画家向来“不依据可靠的知识，以瞬间的印象做画”；“以粗放的笔法做画，作品缺乏修饰，是一种对笔法较草率的画法”。因此，我对莫斯科的感觉仅仅是一副呈现在脑海中的印象派画作罢了。这幅画中有蓝天和白云，有无数教堂的尖顶，有阿尔巴特街上的艺术家们，以及潜伏在一切背后的双头鹰的幻影，还有画布拐角处渺小而又显得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那皑皑的冰雪。

我用十天的时间完成了这幅属于我和莫斯科的画作。这幅画在我的脑海中将永远见证我曾经和莫斯科一起经历过去。它代表莫斯科给我的情感。我欣然接纳这些宝贵的情感，并用自己的心灵加工成一幅印象派画作，回赠给莫斯科。



（责任编辑：过梨雨）

俄乡纪行

——面对俄罗斯青年，我们准备好了吗？

陈曦*

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不得不去的国家、不能不了解的历史、不能不体验的文化，俄罗斯绝对榜上有名。对于俄罗斯及其历史与文化的基本了解，是每一位有世界关怀的人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于中国人而言尤其如此，于以国际关系为专业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机缘巧合，我在研究生阶段听到过许多版本的俄罗斯——或强大得不可一世，或虚弱得不堪一击。不同的历史机缘与多样的价值理念像棱镜一般，折射出俄罗斯的不同面向。而我则愈发好奇碎片化印象背后的真实与逻辑。此次的莫斯科之行，让我得以从俄罗斯青年身上找到些许头绪。

在“中俄学生国际关系暑期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朝八晚十的高密度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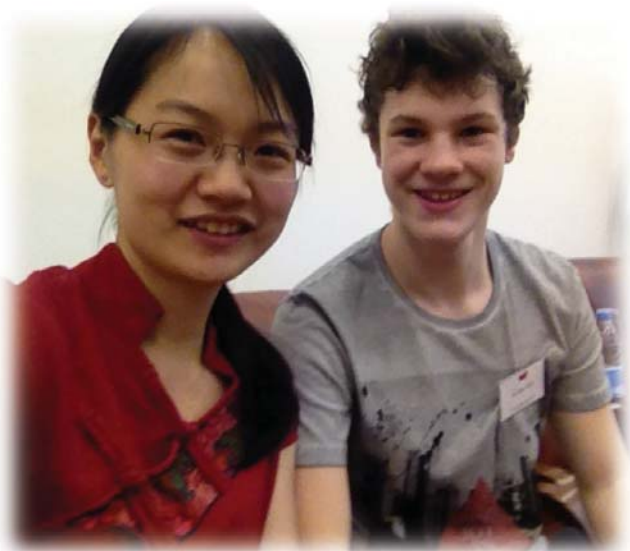


中俄梦之队棋逢对手，脑细胞被调动起来的愉悦与兴奋可想而知。或是在高质量的讲座与讨论中体验头脑风暴；或是在莫斯科河畔、红场教堂、女皇庄园中领略俄罗斯文明的悠久厚重与丰富多彩。

这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地铁里、课堂中、餐桌上与俄罗斯朋友们的一段段对话。通过这些个人交往，我不仅了解到俄罗斯青年对世界局势的观察，更从中感受到了他们的活力与竞争力。对一国未来的判断，青年与教育大概是可靠的坐标之一，就此而言，我们跟战斗民族的确仍有差距。这其中，我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语言能力的差距（外语专业的中国同学除外）。

* 陈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哪里哪里，您过奖了！”去机场接我的小伙子伊利亚在听到我的夸奖时，用颇为地道的中文回答，口音像极了《列宁在 1918》等老故事片里的中文配音。这是我在莫斯科接触到的第一位俄罗斯同学。伊利亚的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却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情有独钟。俄罗斯的中小学提供了外语选修课，伊利亚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了中文学习。“在我学习中文的时候，莫斯科只有两所小学教授中文。周围的同学都在学习法语、德语，大家说：伊利亚你学习中文有什么用呢？可是现在你看看，中文多么重要！莫斯科有几十所学校都开设了中文课程。”每当说中文的时候，伊利亚都得意极了。



语言能力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英语表达能力以及通晓语言数量这两方面。像伊利亚这样通晓三种语言的俄罗斯青年在此次暑期班中相当普遍，并且可以明显感觉到大多数俄罗斯学生的英语能力很强（主要体现在表达流畅、用词准确且词汇量很大）。通晓语言数量的多少其实反应了语言学习能力与学习效率的差距。

在学习语言数量相形见绌的情况下，中国同学的英语能力与英语学习时间也并不成正比。仍记得去年在阿拉木图参加主题为“中亚的现代化与冲突”暑期班时，第一天自我介绍的环节除了基本信息以外，老师还请大家介绍各自掌握的语言。来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除本国语言和英语之外，至少熟练掌握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中的一种；来自中亚国家的同学更是人均至少通晓五种语言，他们除了本国语言以及英语和俄语这两门基本通用语外，对于中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也能熟练掌握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相比之下，我只能很没底气地坦白：“I speak only Chinese and English”。相似的经历不断地在我的个人国际交往史中上演。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的半年里，中国学生被要求在全

英文的环境里完成课前材料阅读、课上讨论和课后论文写作等学习环节，我和其他中国小伙伴虽然学习英语十几年，但仍然倍感吃力；相比之下，来自美国的同学也被要求用中文修习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的宪法与法律、中美经济对比等硕士专业课程，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普遍学习中文仅仅2年到4年，并且相当多的国际学生更是日文、中文一起学。在这一方面，俄国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伊利亚其实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今年刚刚被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亚系录取。几天前收到他的信息：“正在复习商朝的历史，非常喜欢啊！可惜有真少消息，因为商朝是很长时间以前存在的。周朝就没问题呢，资料比较多啊。”他不仅自学中国历史，坚持阅读中文报纸，更试着独立做研究写论文，在中学阶段就独立完成了一篇关于在美华裔劳工的论文，未来他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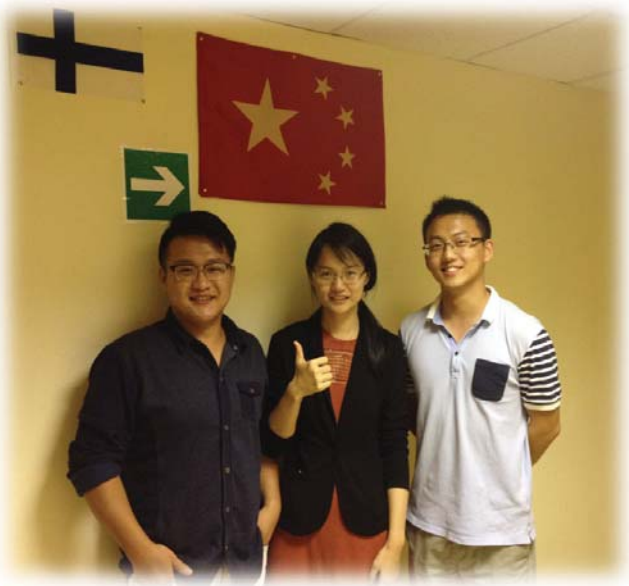
准备写文章向俄罗斯人介绍中国的重金属摇滚乐。



我们在俄罗斯的住处是高等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宿舍，走廊墙上挂满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却唯独缺少一面五星红旗。我们一方面初来乍到，在莫斯科不知哪里能买到中国国旗；另一方面每天满满的行程也让我们无暇出去寻找。热心的伊利亚得知这一消息时，自告奋勇地帮忙，并且坚持不要我们付钱，把好不容易找来的

的国旗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我总是对中国朋友非常感兴趣，所以一定要帮助你们！”

每当遇到这样的俄罗斯青年，我往往先惊讶于他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热爱之深、研究之深，而后就是自愧不如。这种“见贤思齐而内自省”的模式贯穿了我整个莫斯科之行，比如在无意中得知一位“杰乌什卡”（姑娘）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将《管子》翻译成俄文，比如得知另一位“杰乌什卡”年仅22岁已是社会地理学博士生。



俄罗斯青年与他们的语言能力只是我观察俄罗斯的众多切入点之一，蜻蜓点水的莫斯科之行让我无法深入了解更多。此次暑期班接触到的同学也都是俄罗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我并不知道如此优秀的精英们在俄罗斯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但莫斯科行程结束之后，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的精英都是我们中国青年强有力的竞争者，当有一天不得不站在一起同场竞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他们的对手？

花絮：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黄昏里的阿尔巴特大街上，远远飘来苏联老歌《山楂树》（Уральская рябинушка）的旋律。这是一首诞生于1953年的情歌，描写了苏联时期工厂青年的劳动生活与爱情。旋律来自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她抱着一把上了年纪的曼陀铃，蜷缩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一个路灯脚下，头上的绿色围巾一丝不苟地系着，愈发衬出雪白的头发，和消瘦脸颊上深深浅浅的沧桑。她闭着眼睛，不看琴弦，也不关心周围游客又慷慨地放下多少卢布，脸向着远方，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愿去想她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变幻、经历过怎样的悲欢离合，此刻情歌与琴声交错，她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女。

就在此时，游人中传来一阵歌声——“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哦那茂密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我们的山楂树呀为

何要悲伤？”——没错儿，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年妇女，和着曲调与节拍，唱起了《山楂树》的中文歌词！弹琴的老妇人突然睁开眼睛，激动地看着这位路人，愈发投入地弹起曼陀铃。

曲罢，路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国的阿姨仍觉不过瘾，又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等等歌曲，而俄罗斯的老妇人也心领神会，颇为默契地弹奏起来。她也许听不懂中文歌词的含义，但一定感受到了这段相似岁月所带来的情感共鸣。就这样，我站在黄昏中的阿尔巴特大街上，看着这动人的一幕，品味着永恒与青春的滋味。

（责任编辑：刘畅）

学习与反思之行

——记第五届莫斯科暑期学校

朱文清*

转眼间，从莫斯科回国已近一个月，翻看照片，回想点滴，思绪仍会发酵出许多的感想和反思。



* 朱文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着陆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之前，徜徉于蓝天白云，俯瞰镶嵌在地面的片片绿意，我对自己的第一次国外之行充满着期待。

简单来讲，在这次暑期学校中，我记忆最深的是莫斯科的“两术”——艺术和学术。

暑期学校以游览为开端，想必是俄方希望我们在进行学术交流之前能够“脚踏实地”地感受俄罗斯文化，并在游览过程中增加与俄方同学的了解和交流。我们从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大学的一个校区出发，一路穿过莫斯科河，最终走到了心中的圣殿——红场。一路上，雕像接二连三地耸立在街边，诉说着这个城市的成长；古老建筑肩并肩地矗立在道路两边，传达着这个城市的坚持与自信；片片绿荫渲染着短暂而极致的夏天，展现着莫斯科对自然的敬畏。

俄罗斯是一个心思细腻的民族，她很细致地记录着民族的每一个变化，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向世界展示着她的成长；她也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她固执地沿用着祖辈留下来的遗产，并以此来告诉世界她的辉煌；她又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民族，偏执地保护着绿意，并以此保证自己是一个生活在自然中的自然人。



除了红场、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察里津诺庄园中让人震撼的人文艺术之外，俄罗斯对于自然的保护也极大地震撼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前后穿越了好几个公园，我们都极为惊讶的发现，这些公园的前身都是拥

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原始森林，而且这些公园都是位于市中心。我相信只有对自然怀有敬意和敬畏之心的民族才会在喧闹、发达的市中心执拗地留下这片原始森林。

除了感受艺术，此次暑期学校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学术交流。何为“交流”，交换流淌的思想也。而交流的工具则是作为非双方母语的英文。坦诚地讲，从工具的使用上，相对于我们，俄罗斯学生的水平是略胜一筹的。而且，从私下的交流可以感受到，俄方国际关系专业同学有更多的国际交流经历，他们的国际关系思维更加贴近实际。

同时，几位俄方教授的讲座也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们将中国的历史娓娓道来，将中国的民俗和地方概况以他们独有的视角立体呈现，将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一一剖析。其中，有几位教授还直言不讳地谈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指出中国存在文化缺失，外交殖民，政府腐败等问题。我们感谢他们的直截了当，虽然实际情况却并不是他们口中描绘的样子。通过这次学习交流，我们深感中俄之间有了解却缺少理解，有认识却缺少认同。

交流是把交流对象当做镜子来正衣冠的过程，是倒逼着自己去反思和成长的过程。很感谢能够参加这次集体出行的莫斯科暑期学校，它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反思自己，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同时，也开始重新“脚踏实地”研究神奇的俄罗斯。



（责任编辑：过梨雨）

巴黎印象

丁端*

2015年夏天，我只身前往巴黎，在巴黎政治学院参加为期四周的法语课程。

每个学过法语的人大概都对巴黎这座城市怀有一种莫名的情愫，而我恰好是个例外。在我的臆想中，巴黎代表着布尔乔亚式的小资情怀，并不符合高歌猛进的时代画风。电影《午夜巴黎》中，身为作家的男主角遭遇事业和感情的双重危机，却在充满怀旧气息的巴黎重拾对生活的热情。诚然，巴黎是文艺青年们的温柔乡。

初到巴黎，什么都是新奇的，然而看它的第一眼并不惊艳。戴高乐机场陈旧而聒噪，大区快线的列车仿佛从上世纪飞奔而来，地铁的车门需要按动按钮甚至拨弄把手才会打开，“国际”大学城的前台女士完全无法用英文沟通……然而，当我安顿下来，开始“触电”巴黎，这座城市的魅力却在不经意间缓缓流淌，流进记忆的最深处。



* 丁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艺术的王国

巴黎以文化艺术的发达著称于世，法国人也对此津津乐道。巴黎的博物馆、美术馆数量多到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其服务水平堪称世界一流。卢浮宫的收藏跨越人类历史、触及世界各地，从古埃及的人物雕塑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法国的珍宝库；奥赛博物馆的藏品以绘画和雕塑为主，是欣赏新古典主义和印象派、后印象派作品的绝佳去处；匠心独运的橘园美术馆用几个独立的椭圆形空间集中展示莫奈的作品，如果你想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橘园不会让你失望；集美博物馆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蔚为大观，保有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个时期的艺术精品，让我这个东亚艺术迷大饱眼福；凡尔赛宫藏有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时期皇家收藏的各式绘画和雕塑，整个宫殿至今仍金碧辉煌，而著名的镜厅更是让国关专业出身的我浮想联翩……



巴黎人

说到巴黎，不能不说说巴黎人。曾有人开玩笑说，巴黎的游客可能比本地人还多，我表示部分同意。塞纳河畔、香街、铁塔、卢浮宫等地标附近，几乎清一色的游人，然而只不过走两条街，绕过街角的咖啡馆，情况

就完全不同了。巴黎人喜欢坐在面朝马路的椅子上，点一杯酒，看街景，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看这个他们生活的城市。地铁里的巴黎人更加特征鲜明，人手一本口袋书便是他们的标志。赶时间上班的男男女女们绝不会放过利用搭乘地铁的一点点时间来读点什么的好机会。车门一开，他们鱼贯而入，熟练地找到属于自己的临时空间，摸出书本便一头扎进另一个世界。巴黎人对时尚的追求也是与生俱来，简单的搭配就能穿出不一样的感觉，夏天也有很多人不忘带一条围巾出门。经过一个月的“观摩”，一向对时尚无感的我也开始羡慕起来，跃跃欲试了，看来还是环境造人。



海明威有言：“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生活在巴黎，那么以后无论你去哪儿，它都会跟随你左右，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与作家毫无保留的称赞相对应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巴黎是全世界文学、艺术从业者和爱好者们心驰神往的所在。一个月的相处，我意犹未尽，临走时才发现愿望清单上还有几项未能实现。或许，遗憾也是人生的注脚和前进的动力吧。

（责任编辑：刘畅）

感悟土耳其

杨一帆*

今年初，有幸申请上了赴土耳其 Ipek 大学进修土耳其语的项目，得以有机会对这一印象中颇为神秘的国度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在为期一个月的访学中，我感受到了千百年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这片土地上的多维度冲撞与交融，目睹了史诗般雄伟壮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我欣赏伊斯坦布尔作为千年古都的奢华与品位，也喜欢安卡拉街头的安宁与祥和；我感慨科尼亚这一保守地区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做出的挣扎与妥协，也惊异于卡帕多西亚——以热气球闻名于世——还有作为人类文明最早发祥地之一的美誉。但是，在这些景致背后，我更希望了解与呈现中国与土耳其百年来的交流与碰撞。



特别远，非常近

12 个小时，是从上海直飞伊斯坦布尔所需的时间。这个几乎横跨整个亚洲的航班，只比飞往美国的航班少两三个小时。土耳其，这个与中国相距遥远的国家，实际上有着与我们相似的命运与经历。

* 杨一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1500年，世界进入近现代之时，新兴的奥斯曼帝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正雄踞于亚洲大陆的两端。此时，两个帝国都未曾想象到，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现代化对各自帝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更早进入欧洲政治博弈的战场，更早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旨在“学习西方，挽救帝国”的名为“坦齐马特”的革新运动，但其命运却也更悲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威震基督教世界的古老帝国被瓜分殆尽，若非凯末尔将军（Kemal Atatürk，凯末尔是其名，土耳其人一般称呼姓“阿塔图克”）领导土耳其人进行了激烈残酷的独立运动，土耳其的版图大约只会有今日的三分之一。

在历经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侵略之后，很少有人能比土耳其人更深刻地领会到独立自主的可贵。1923年取得独立建立共和国后，保障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就成为土耳其领导人的核心关切。凯末尔清醒地认识到，若要在伊斯兰教浸染颇深、民风保守的土耳其建构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就只有依靠政治权力强行推动，并依靠民族主义来化解宗教势力的话语霸权。为此，凯末尔建立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并以立法形式禁止其他政党的存在，确保了世俗力量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掌控；废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称号并将其驱离出境，废除伊斯兰教法与宗教法庭，粉碎了宗教势力企图依靠苏丹影响政局的企图，将宗教势力彻底清除出国家权力体系；推动文字改革，以相对简单的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把教育权利从宗教团体收归国家；创立并发展“土耳其史观”，以民族主义的叙事讲述历史，使民众的效忠对象从伊斯兰教转向民族国家。在凯末尔党人看来，实现现代化与建构民族国家是确保土耳其共和国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唯一途径，因此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成为现代土耳其的立国准则与精神支柱。

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其革命的成功自然有其外溢效应。实际上，与此同时期的民国精英中有不少人也因土耳其革命与改革的成功倍受鼓舞，认为土耳其革命与中国革命是亚洲觉醒的重要标志。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土耳其精英在二三十年代提出的现代化主张与口号，与同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主张的现代化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土耳其人提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时，国民政府也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虽然笔者并不清楚两者之间是否有过相关的沟通，但这至少说明在殖民主义尚存于世的年代，亚洲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

过程中存在一些必须面对的共性问题，即政治上的统一与具备较强国家能力的政府的成立是亚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想像的共同体

在土耳其，最常被土耳其人问起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人是不是吃狗肉，二是有关于新疆问题。第一个问题并不想在此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在国内外都广受争议的话题，土耳其人对此感兴趣并不意外。有趣的是第二个问题。土耳其与新疆远隔千山万水，新疆何以能激起土耳其人如此广泛的兴趣呢？

如上所述，土耳其共和国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的建构中，民族史观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自身史料的积累非常缺乏，以至于建国之后还不得不使用欧洲人编纂的、充满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历史教科书。为改变这种情况，凯末尔亲自主导了建构“土耳其史观”的进程。通过对赛义德“东方学”的曲解、当时考古学的零碎发现和大量主观臆想的揣测，土耳其官方形成了一整套缺乏实证基础、宣扬民族优越性的史观，并以此为基础作为历史教科书编纂的主导思想。这套史观认为，土耳其人是突厥民族最纯正的代表，而突厥民族是人类文明的创立者。在中亚气候日趋恶化后，突厥人从中亚迁居欧亚各地，所以欧洲文明实际上也是由突厥人创立。客观地讲，凯末尔党人的历史论证有明显的托古改制的企图，他们希望借证明土耳其人与欧洲人源出一脉来证明向西方学习的合法性，也希望借此历史荣光激发土

耳其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因而带有其进步性。但是，这种史观在“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突厥民族，使得原本与土耳其人无关的内亚鞑靼人、维吾尔人等——在土耳其人眼中——成为了同宗血脉。

尽管凯末尔在建国之初便否定了“泛突厥主义”，但这种决策主要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而非历史文化层面的批判。当然，凯末尔党人也不可能从精神文化层面根除“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亟需民族主义激发爱国热情的情况下，这种理性客观的批判与探究无异于对民族建构的阉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缺乏实证基础的史观很快被抛弃，但是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泛突厥主义”却依然影响着土耳其人的世界观与外交政策。在土耳其人看来，关心与其“血脉相连”的维吾尔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例如，曾经有位土耳其同学理直气壮地质问我：“相对于不断涌入的叙利亚难民，土耳其政府难道不更应关心新疆的同胞兄弟？”

至于疆独组织在土耳其境内大肆扭曲宣扬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民族的迫害政策，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若非土耳其人对新疆格外“上心”，这些疆独组织也不会土耳其兴风作浪。笔者只想说，政治说到底要靠阳谋大道，阴谋诡计必不得长久。当年土耳其精英为了塑造民族意识而刻意扭曲历史，如今也正为此背上沉重的负担。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下，土耳其并不具备挑衅中国的能力与资本，一味地纠结于新疆问题，无论是对中土关系还是对土耳其自身都没有半分好处。但遗憾地是，就目前中土两国国内情势而言，这个问题短期内根本看不到解决希望。

一位曾经在包括中国、韩国与土耳其在内的欧亚多国工作过的美国老师对笔者说，韩、中、土是他见过的民族主义情绪最浓厚的国家。笔者相信他的观察有一定依据，而这种现象的背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作为尚未完成现代民族建构的两个国家，中国与土耳其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极端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有着众多值得进行比较研究的领域。我想，这也是美景美食之外，土耳其的另一重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王志浩）

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暑期班体验

王志浩*

2015年8月3日至6日举行的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暑期班，是我今夏参加的第二个暑期班。因为课程安排的比较紧凑，所以这短短4天的学习之旅让我感到格外的充实。在这4天的学习生活中，我不仅了解了国外学者比较前沿的研究成果，也结识了国内外的硕士、博士和媒体工作者，通过与他们的互动和交流，既让我感受到了与许多国内外学生的差距，同时也收获了信心。

本次暑期班是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共同举办的。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的学者与北京大学联袂为100多位国内外青年学生和媒体人员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虽然这是一个以“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为名的暑期班，但是课程内容十分丰富。本次暑期班采用全英文授课，总体上来说课程是围绕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安全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展开的。具体开设的课程涉及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博弈论、中国外交等领域。多样的授课形式也是本次暑期班的亮点。除了讲座式的授课，还安排了又 roundtable discussion、spark talk 和 workshop 环节，充分地让学员能够参与到课程讨论中。

暑期班的课程丰富，形式多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部分内容。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暑期班第一部分的内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查道炯教授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国外不同学派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他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在目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家正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未来中国能否提出一套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支持中国国家的对外战略，是值得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思考的。

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系的戴欣媛副教授做了“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Order”的主题演讲。首先她提出了两个问题：什

* 王志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么是国际自由秩序？中国的崛起对国际自由秩序的影响？根据她的陈述，所谓的“国际自由秩序”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由化的国际经贸秩序，还包括了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秩序。她与她的同事共同建立了数据库来测量中国与“国际自由秩序”的相关程度。该数据库收录了各国加入多边协议与议定书的时间、数量以及协议所涉及的领域。

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亚洲研究的 Soo Yeon Kim 教授则把目光聚焦于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她展示了亚洲金融危机过后 PTA（特惠贸易协议）与亚洲区域一体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她认为，虽然亚洲国家在政府层面上主张区域主义，但在实践中，是由大量的私营部门特别是跨国公司建立起来了庞大而复杂的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推动着区域化的发展，并且积累了政治影响力。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化和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和亚洲生产网络的作用。

国际安全是本次暑期班的主要内容之一。提到国际安全，自然离不开当前备受瞩目的中美关系。在当前由南海问题引发的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来自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 Robert Pape 教授做了一场题为“A US Conventional War With China Is Not Going To Happen”的演讲。Robert Pape 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的学者，2008 年美国大选期间，Pape 教授担任过奥巴马的政策顾问。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就学术层面而言，Pape 教授在相关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暑期班的学员对于他的授课都表示十分期待。

Pape 教授首先回顾了米尔斯海默、戈德斯坦等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对于中美之间将爆发战争的观点，然后对于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Pape 教授认为，1945 年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终结了二战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分水岭。1945 年之前的国际关系史，大国之间的首要目标在于争夺地缘上的霸权。但是，随着核武器时代的来临，即使国家间具有一定的冲突，但是国际关系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在核时代保持大国间的平衡。在这个基础上，Pape 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核时代中美两国不会因为冲突（conflicts）而走向战争（Conventional War）。他建立了有核国家危机升级的决策模型，把国家间从冲突发展成为战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挑战现状”（Challenge Status Quo），第二个阶段是“常规军事部署”（Conventional Force Deployment），第三个阶段是“常规战争”（Conventional War），最后一个阶段是“核战争”（Nuclear War）。Pape 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对于战争情

势的决策点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作为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不会采取是冲突升级成为核战争状态。根据笔者的理解，Pape 教授实际上对于现实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解，认为核时代的国际政治是在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同时以寻求国家间关系的平衡。

芝加哥大学安全与恐怖主义项目的团队人员也出席了今年的暑期班，有的是纯粹的学者，有的是刚刚从美军中退役下来的女兵，他们从比较围观的角度介绍了他们对于国内安全和恐怖主义的研究成果。其中，我对来自于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 Jennifer Jordan 的研究颇感兴趣。她的演讲题目为“Explaining Terrorist Group Resilience to Leadership Targeting”。她的这一研究源自于她对各国恐怖组织发展的长期观察，发现有一些恐怖组织由于领导人被实施“斩首行动”击毙之后就分崩离析了，如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然而有一些恐怖组织即使领导人相继被除掉了也能够很好的运作下去，如哈马斯和基地组织。通过比较研究，Jordan 教授提出了“组织恢复理论”（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她认为，在领导人被击毙后恐怖组织继续运行下去的关键因素在于组织的官僚制（Bureaucracy）和集体支持（Communal Support）。官僚制从组织规则、标准运行程序和分层化管理为恐怖组织提供了组织的稳定性。集体支持则是恐怖组织利用嵌入到群众中，建立了一套保护网络，收集可利用的资源和群众提供的保密性而使得组织具有恢复能力。中国也是一个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像是“东突”这样的恐怖组织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公共生活安全。笔者认为，Jordan 教授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恐怖组织的活动、扩张和传播具有启发意义。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笔者认为本次暑期班涉及的内容并不是太多。中方教师主要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方面来介绍的。国外教师，主要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则主要集中讨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因果逻辑（Casual Logic）。Pape 教授在第一天的课程中就着重介绍了因果逻辑。根据他的介绍，因果逻辑是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十分侧重的方面。一个理论的构建，关键在于在思想上要建立一个可靠的路线图，即有原因（Causes）推导出机制（Mechanisms）再得出结果（Outcomes）；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的 Andrew Moravcski 教授介绍了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定性研究中的“数字化引用”，另外他还对美国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做了介绍；北京大学的王栋教授介绍了他最新提出并且正在完善的国际关系

中的“对冲理论”（Hedging Theory）。该理论的生成是来自于王栋教授对中美两国之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的研究。“对冲理论”试图解释在亚太地区以美国主导局势，中国国力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如何进行战略选择。王栋教授设置了“相对能力”（Relative Capability）和“威胁认知”（Threat Perception）来测量国家是否运用对冲手段。所谓的“对冲”近似于通俗意义上理解的“两面下注”。

本次暑期班另外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主办方为学员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充分的机会。Workshop 的环节是讲习班的亮点之一。100 多位学员被分为四个小组，分别参加了 4 组话题不同的 Workshop。每一场由一位来自于北京大学或者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对其准备发表的论文进行展示。展示结束有当场的点评教授进行点评。最后由现场的学员针对他或她的论文提出疑问和新的观点，为文章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设性意义。笔者被分到了的文章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沈玉冰所著的《后冷战时代两岸关系中的有效威慑》，这个主题也是笔者比较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该研究提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慑能力成单峰状态，即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台威慑能力呈上升状态，而在 2008 年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之后的中国大陆的威慑能力相对下降。作者对冷战后的两岸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历史回顾，对两岸军事力量的对比也做了详尽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证明和事实。在阐释大陆对台有效威慑上，比较了两次台海危机和政党轮替前后的政治局势，试图对大陆威慑能力的变化进行解释。参与 Workshop 的学员积极地向沈玉冰博士提出问题和建议。笔者提出了一个疑问，美国不同时期不同的总统和行政班底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是否也应考虑作为影响中国大陆对台有效威慑的变量。现场的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远远超过了原先设定的时间。Workshop 结束之后，一些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学员依然继续讨论。

通过参加本次暑期班，笔者结识了一些国内外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朋友。在课程的茶歇期间，笔者和来自美国的博士 Christian 就区域一体化问题展开了交流，从与他的对话当中笔者深深的感受到了在理论功底和阅读量方面与国外学生的差距；在休息的时段，笔者与来自凤凰网国际新闻的编辑进行了交流，了解了媒体从业人员对于暑期班课程所涉及的议题的不同看法；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笔者认识了师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汪诗明老师，现在在湘潭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专业任教的许善品学长，并与学长交流了本次暑期班的心得体会。许善品学长作为毕业于我院的前辈，为笔者的学习规划、未来的发展和职业选择提供了建议。

总的来说，笔者十分感谢北京大学和芝加哥北京中心能够提供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让我在北京短暂的学习之旅获得了超出期待中的收获。当然，本次暑期班最大的挑战还是语言，不过全英文的授课并没有对笔者理解课程内容造成较大的障碍。笔者在北京，在芝加哥中心不仅度过了4天充实的学习生活，也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获得了有益的建议。感受到了差距，也积累了信心。接触到了比较前沿的学术话题，学习到了系统的研究设计。开始有勇气和外国学者和学生交流。借用 Pape 教授所说的一句勉励大家的话 “You are the future !”



（责任编辑：刘畅）

上海交大——密歇根大学暑期社会科学方法 培训班回顾

任伟*

2015年7月1日至7月12日，我参加了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办的“上海交大——密歇根大学”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举办。培训班期间，美国密歇根大学 ICPSR 授课教授 Philip Brenner、堪萨斯大学 John Kennedy 教授、杜克大学 Melanie Manion 教授、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Mary Gallagher 教授和清华大学孟天广博士联袂为学员讲授关于“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问卷设计与访谈”、“定性研究在中国”和“在中国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等课程。讲课老师采用分组研讨、分析软件演示、个人研究设计展示等方式引导学员采用科学规范的方法进行实证社会科学研究。

选择参加这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首先是因为我计划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做硕士毕业论文，这也与我研一下学期学习的两门课程紧密相关，一门是本学院包承柯老师开设的“政治学方法论”，另一门是在闵行校区社会发展学院开设的跨学科课程“定量研究方法”。这次培训班课程中密歇根大学 ICPSR 授课教授 Philip Brenner 讲授的“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一个社会调查进行的过程，特别是前期抽样的工作，这部分内容虽然我这学期学习的两门课程也有所涉及，但是限于课程安排和时间限制没能详细展开，只是做了粗略介绍。通过 Philip Brenner 教授的讲解，我对抽样调查方法的选择、误差的分析等内容有了更好的理解，这对于我今后自己组织或参与社会调查，解读和分析定量研究数据都十分有帮助。

其次，密歇根大学拥有深厚的定量研究传统，对美国选举有长期的跟踪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特别是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值得立志进行政治科学研究的学者借鉴。Philip Brenner 教授用六天时间详细讲授了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后，又亲自演示了使用 Stata 软件来处理研究数据的方法，使用这一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等操作。与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使用广泛的 SPSS 软件相比，Stata 软件在美国大学的研究者中更受到青睐。

* 任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第三,堪萨斯大学 JohnKennedy 教授、杜克大学 Melanie Manion 教授、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Mary Gallagher 教授主要从事的是中国实证研究,他们比较擅长的方式是访谈。虽然中国研究的经验不能直接照搬到我现在学习的国际关系学科中,但是他们从事国别研究的经验却是值得我们借鉴。作为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计划把国别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实地去目标国做长期的田野调查虽然不太容易实现,但是可以依靠这些国家社会调查机构公开的调查数据来进行研究。杜克大学 Melanie Manion 教授利用中国新浪微博的公开数据来研究中国网民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的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实,美国政治学界已经出现了许多利用 Twitter、Facebook 等网络社交媒体的公开数据来进行政治行为研究的成果。

这次培训班的学习让我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结合这学期政治学方法论课上,我作为课代表组织大家做的“上海大学生国际观调查”的研究设计,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例如实际抽样设计中的问题、问卷设计等都在这次培训班的学习中找到了比较妥当的答案。实证研究的思路对于了解社会事实的真相,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寻找合理的理论解释和解决办法有很有效的回应。这种方法应该成为我们政治学研究认识问题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值得我们硕士研究生学习和借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正是我们学术研究所要掌握的“器”。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还需要进一步熟悉数据处理的方法,特别是对已有数据的分析。



(责任编辑:王志浩)

上外区域国别研究暑期学校随感

刘娅楠*

区域国别研究暑期学校是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协办，希望能够培养区域国别的研究人才，本次暑期学校成员也是涵盖了包括国际关系、各外语专业在内的 46 个专业的同学。整个暑期学校由三部分构成：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引导，这一部分主要由秦亚青、郭树勇、张宇燕以及杨洁勉教授讲授；区域国别主题演讲，包括美国研究、中东研究、欧盟研究、东盟研究、中亚研究、俄罗斯研究、东北亚研究、一带一路相关问题、南亚研究、日本研究、德国研究、东亚研究等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的区域国别研究讲座；最后一部分是暑期学校的成员发言，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互相批评、互相质疑、相互进步。



住在上外

基于大范围暑期学校不提供住宿这一现实，上外在提供食宿这一点算得上是业界良心了。但我仍然做好了住宿舍的心理准备（这是提供住宿的夏令营的标配），却发现可以住在宽敞而且还有独立卫浴的旅馆，这是上外送我的第一份惊喜。其次时间安排也非常合理，上午下午各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午留有两个半小时休息时间，睡眠是一个人最好的休息，在中午的休息过后，大家都元气满满地回到教室。

* 刘娅楠，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吃在上外

尝到了传说中的“上外菜”，各大高校的食堂菜一直备受关注，像我们华师大的油条攒蛋和玉米炒葡萄，而上外菜并未榜上有名，这让我安慰放心许多。事实证明，上外食堂的师傅也是挺用心的，每天准备的荤素搭配都有所变化，水果也是有严格的排班表，今天是小苹果，明天是番茄君。自从暑期学校开始后，上外食堂中就总会多出一个队伍特别庞大，在这个队伍中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认识了新朋友，或是老乡、或是校友、也有志同道合者。



最后的晚餐

学在上外

本次暑期学校包含了范围非常广泛的区域国别研究专题，非常像疯狂的十天集训式讲座，期间还要两篇小结和新闻稿讲座听录锻炼，安排很紧凑，内容也相当丰富。对于刚刚开始自己的学术道路的人来说，这是一次了解各个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确定自己研究兴趣的大好时机。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却不仅仅于此，主要有两点较深的感触：

一是各位专家在一些焦点问题上的思想交融，例如，多位专家都在讲座中提到了对南海问题的看法，我国建国之初，刚提出南海九段线时，这一提法获得了南海周边国家的认同，并无国家反对，之后几十年中国政府的无作为导致了现如今尖锐复杂的南海问题。黄仁伟教授提出，政府之前

在南海问题上的不作为是因为武力不能辐射至南沙群岛的最南端，无法对南海主导实施实质性保护。在此基础上，沈丁立教授提出南海研究的止步不前也是导致我国在国际交涉中屡屡受阻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我国尚且无法拿出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南海的划界问题。

二是各位教授在理论构建和思维训练等个人学术能力提升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张宇燕教授强调一定要将书中重要的观点、论据或数据记录下来，并标清索引，做笔记的方法人人都清楚，却不是都可以做到，他说这虽然是细节问题，但却对他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帮助。如果有长远地做学术研究的打算，我想有条理的数据、资料收集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提到自己比较重视思想性和方法性，认为中国学生教育中科学方法论方面有所欠缺，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读经典来弥补这一点。国际关系学者不仅仅应该拥有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和对研究对象国的深入了解，自身的逻辑思维也很重要。他在整个讲座的过程中不断地用例子来引导我们去思考，去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张宇燕老师在谈到预测的重要性时，提到一点，预测的准确性如何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进行预测则意味着把一些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但如果预测结果不够准确，那么即使相关的因素纳入考虑意义也不是很大，提前所做的相关准备并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所以预测的准确性在我看来还是首先应当得到保证的一点。

附录：张宇燕老师所提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参考书目

- 柏拉图，《理想国》；
- 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 舍克，《嫉妒论》；
-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呵利润》；
-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
-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 贾汉贝格鲁（编）：《伯林谈话录》；
-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
- 卡尔，《历史是什么》；
- 卡尔，《20年危机》；
- 查尔默斯，《科学是什么》；
-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 米尔斯，《权力精英》；
-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
- 拉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 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
- 加尔布雷思，《权力的分析》；
-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
- 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
-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
- 弗格逊，《金钱关系》；
-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 麦基（编），《思想家》；
- 孟柯，《孟子》；
- 基辛格，《大外交》；
-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
-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
-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 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
- 费孝通，《中国绅士》；
-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
-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 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
- 奈格里和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 洛伦兹，《攻击与人性》；
-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 弗兰克，《白银资本》；
- 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韦伯，《学术与政治》
- 霍布斯，《论公民》；
- 卡多佐，《法律的生长》
-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 康德，《道德行而上学原理》；
-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
-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 罗素，《自由之路》；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 谢林，《冲突的战略》；
-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
-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 波普，《猜测与反驳》；
- 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
- 德勒巴克(编),《新制度经济学前言》;
- 斯笛尔(编),《20世纪七大思想家自述》;
- 克莱因(编),《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 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国际货币:过去、现在和未来》;
-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
- 史景迁,《皇帝与秀才》;
- 李约瑟,《四海之内》;
- 斯威伯格(编),《经济学与社会学》;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
- 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
- 亨德森,《欢乐的经济学》;
- 托兰,《希特勒》;
- 道尔,《拥抱战败》;
- 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 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
- 汤因比与迟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
- 斯蒂格勒,《经济学家与说教者》;
-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
- 汤因比,《历史研究》;
-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 阿罗,《信息经济学》;
-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责任编辑:刘畅)

漫 说 时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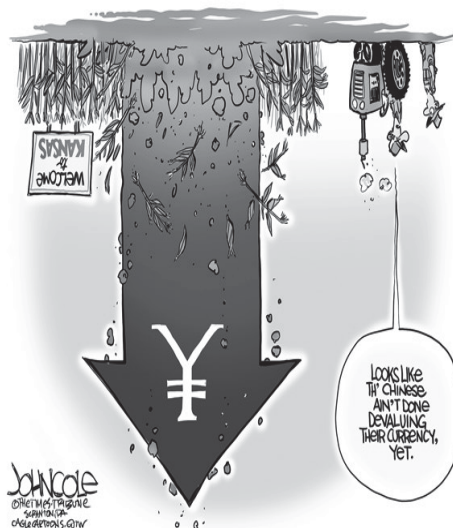
Greek Economy 希腊的经济
作者: Marian Kemensky



Mexican Economy 墨西哥的经济
作者: Dario Castillejos



Hillary's Pantsuit 希拉里的服装
作者: Adam Zyglis



Chinese currency devaluation BW
人民币的贬值
作者: John Cole

(责任编辑: 过梨雨)



新闻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评纪录片《米字方向》

刘力铭*

“你做了这个选择，你十年之后会不会后悔，你现在做的选择，是不是你想要的。”一部关于新闻人在纽约的纪录片《米字方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刷屏，毕业于新闻系的我和我的同伴们感同身受，纷纷转发并留下了自己的想法。

光鲜的背后是迷失方向

《米字方向》是一群 2013 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为自己这一年的研究生生活所拍摄的短片。作为世界顶尖的学府，由普利策先生于 1912 年所创立的哥大新闻学院在这一年招收七位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大抵来自北大，国关等国内知名高校。看似走向人生巅峰的他们，却在这一年里经历了更多的五味杂陈。

迷茫，迷茫，迷茫。每个人都在片中表达了自己的迷茫，不知道这一年之后会怎么样，他们感到迷茫；回国还是不回国，他们感到迷茫。他们的迷茫来自于身份认同，“你过来之后是为了学习对中国的报道的，但是你报道的东西是在一个拉丁裔的社区，报道他们的孩子医疗问题，然后住房问题，新开了什么皮鞋店，甚至说街上出现了田鼠，就这种东西你会觉得我到底是去为了什么来美国学新闻呢，压力本身我可以接受，但这种迷茫感困扰了我一个半月。”他们的迷茫来自于报道的方式，“教授给我的所有修改意见，他们在努力的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但是你想一想，他们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很多意识的东西是潜移默化已经被影响的。其实我发现我思维很中国，很亚洲，我一开始会觉得是坏的事情，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坏的事情，我为我很中国而自豪，因为如果你不自豪，你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国人来呈现，他们就会歧视你”。

迷茫不仅仅来自于外界本身，还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新闻理想与美国现实的碰撞。而这样一种碰撞不仅仅在于美国，国内学新闻的学

* 刘力铭，自由撰稿人，毕业于新闻系，现居哈尔滨。

生也在经历这种碰撞，书本上的知识在新闻生产中没有办法适用，老师课上讲的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毫无用武之处，甚至四年里浸染的新闻理想被别人当做笑谈。

在美国学新闻，经历了各种稿件作业的轰炸，经历了毫无个人的生活时间，经历了东西方报道理念上的差异，而迷茫还来自于毕业之后的出路。

毕业之后敢问路在何方

一年的研究生光景非常快，而学年过半就必须开始为自己毕业之后的事情做打算，而这时其实也才刚刚来到这所学校半年。选择回国是一条看起来最保险的道路，而更多的学生则选择了留在美国。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新闻业出现了混乱，上万的新闻业的职位被削减。而留学生毕业后需利用学生签证拿到一年的合法工作 OPT（可选择性的实践训练项目）之后需要申请 H1B（即工作签证）来保持合法工作身份。如果你想继续留在这里工作，你的雇主必须担保你，而申请工作签证时，雇主必须证明这个职位是本国公民无法胜任的。工作签证 H1B 能否申请成功，不仅取决于雇主是否愿意为雇员申请，也要看在申请之后是否能顺利通过美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抽奖”，抽中的几率依情况而定。

在他们七个人这一年的哥大新闻学院的招聘会上，适逢新闻学院一百周年，而就业的情况与一百年前惊奇的相似。有的人为了留下来再一次申请了硕士，“申请硕士目的也很明显，其实就是想说再多留一年，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不切实际的说也许多留一年事情就会有转机，回国就意味着输掉所有。”

不招收留学生，即使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拿到工作签证让这些哥大的中国新闻学子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而就是这样艰难的就业环境和对外国留学生的不公平待遇，使得中国的公民无法成为外媒的全职记者，而只能担任助理或者分析员等岗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中国平衡报道的出现。因此有的学生避开了美国严峻的就业形势，选择回国，“中国在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与其关心美国社会的发展，我不如回去看一看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选择回国发展的屈指可数，更多地选择在美国，在那个被他们称作“没有多少人情味”的纽约继续等待和蛰伏。

焦虑冲突让新闻不从容

反观中国的新闻教育，焦虑与冲突更加的充斥在我国的新闻教育当中。

曾经听某位老师讲过一个段子，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说自己有新闻理想，要做记者要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投身到中国的新闻事业当中去，最后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去了房地产行业做公关。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个段子，这正是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我想这样的事实应该不仅是个例，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的严重脱节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媒体更青睐于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也早已经喜闻乐见。片中在招聘会上，他们不停地被问你编程吗？你会编程吗？这不仅仅是未来新闻的发展方向，更应该是新闻教育发展的方向。

然则现在在国内的新闻教育上，院校当中大多数的老师没有新闻采编的经验，大抵是学院派出身空谈理论。新闻生产上，新闻炒作、新闻敲诈等新闻伦理事件极度的透支了行业的公信力，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记者构成上，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不提倡记者要一直做下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如果还在做记者会被人耻笑。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中，这样的焦虑和冲突让新闻变得不从容了。

而在美国，远赴大洋彼岸的学子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焦虑与冲突，还有身份的认同，意识形态的碰撞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出国深造并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甚至是一个无限的荣耀。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出国留学的人数在逐年激增，每年几十万学生走出了国门。他们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会陷入深深地迷茫，我想这不仅仅是这部片子给所有学新闻的学生的意义，还是会让那些走出国门或者即将走出国门的学生有所思考。

新闻理想依旧可以实现

我们不能否认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变，在转型期之下的中国每天有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发生，贫富差距，官民矛盾，医患关系等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为中国的记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这是一片最适合做新闻的土壤。

我也曾有幸的在大学期间走入了新闻系，四年的学习让我明白了在当前的时代里做新闻是需要理想的。入学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同学抱怨自己是被某某系退档调剂过来的，毕业之后周围的同学中做记者的寥寥无几，或从事编辑或从事新媒体运营，真正深入一线去采访的人越来越少，而有新闻理想的同学也因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被拒之门外，最后真正收获记者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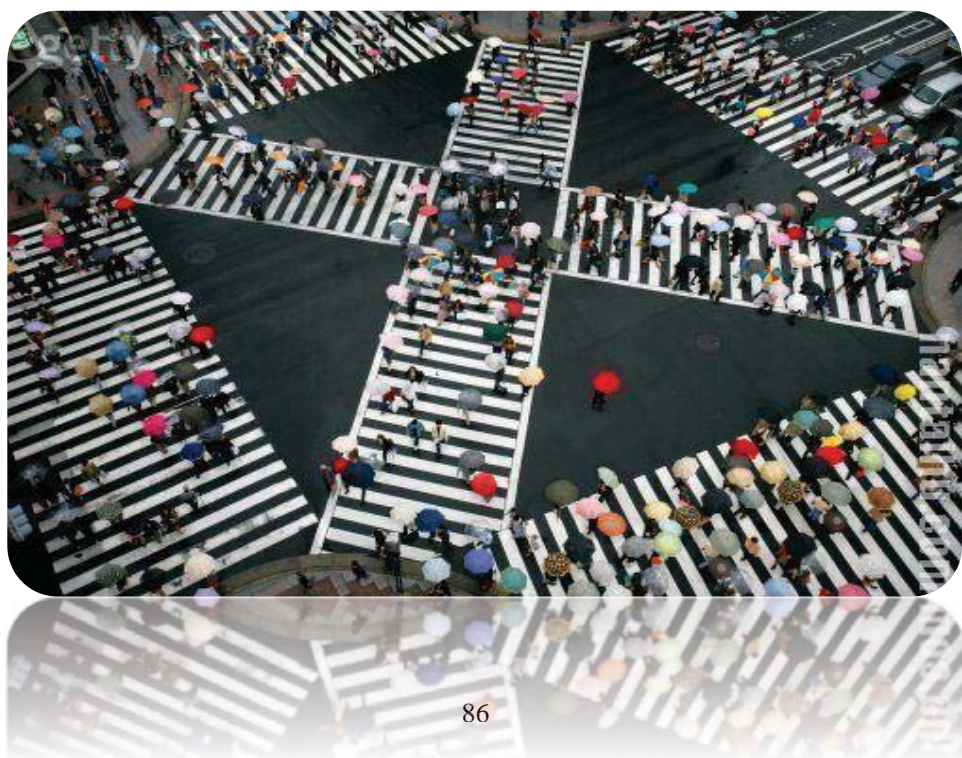
一份职业的人屈指可数。记得某报社来我的母校招聘记者，最后录用的十个人没有一位是学新闻专业的，按说新闻专业的学生才是记者最对口的人选。但是用人单位却说，写新闻三个月就可以学会，新闻专业的学生并不具备我们需要的专业知识。而这也是对新闻专业的又一次拷问。

有的时候新闻是需要一点理想的，记者的工资不高，采访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这让记者的生存受到了无比大的压力。更接地气地接触社会，见惯了更多的负面事件让记者也饱受着精神压力。而这时候，这点理想就有了它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可以支撑着我们走下去，还是让我们在对待采访对象和稿件时所表达出自己的态度。

面对当前传统媒体亟待转型，纸媒生存越发凋敝的环境，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初学了新闻这个专业。我依旧觉得我很有幸读了这个专业，因为它让你看清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它会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到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也就是这些个体构成了我们当前所看到的这个国度。所以我一直都喜欢着这个专业。

或许是专业的相同让我对这部片子有了更深厚的感情，让我一看再看。在时代的洪流里我们谁都无法逃避现实，我们也会遭遇到不知所措和迷茫的境地。在那时，我们的理想会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世俗。我们的理想会与现实交战，无论结果如何我始终希望，永远别让我们的理想败给现实，不管是新闻理想亦或其他。

（责任编辑：刘畅）



大师戏笔今犹在，梦中红楼未可知

——读《大汗之国》有感

刘畅*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国际关系研究也好，区域国别研究也罢，围城里的人大体聪明而理性，在看对象国时眼神势必如鹰隼，犀利而冷峻，断然没有“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戏谑与柔情。如若有，要么不精此道，东施效颦；要么大师情怀，虚怀若谷。我想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大汗之国》必是后者。本书是西方汉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以20世纪三位公认的天才作家对中国的观察作为完结篇，以一“戏”字点睛，妙趣横生，又不乏智慧的火花。书中提及的三位分别是法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豪尔赫·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此三人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亦从未踏上过中国土地，但在他们的小说中都曾以中国为写作题材，而其所产生的三本书也被公认为关于中国最具美学成就的三本书。

大师戏笔，戏在何处？

卡夫卡的《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以长城来讨论权威问题。卡夫卡的长城，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创造，对其建筑的方法与存在的理由，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兴建长城的目的何在？”通常我们的理解是防御北方外族，但是作者通过书中的叙述者问道：如果是防御北方外族，那么为何要从遥远的南方召集这些工人以牺牲其生命的形式来修筑长城？有人会说那是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是体制性常识却告诉我们，上级从来都不会将紧急征召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实现梦想，而只会急着破坏一切。于是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修筑长城的想法是亘古就有的，而北方外族根本就不构成筑墙的动机，那筑墙为何？这个答案可能就在民族心理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墙只是地基，其目的是建造新的巴别塔（Tower Of Bable），所以问题是“先修墙，再盖塔”的理论是如何映射到民族心理当中的。作者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中有种暧昧性，即处

* 刘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于确定和模糊之间。比如说筑墙这件事就与这种暧昧性息息相关。即大家并不确定最高层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去揣度，比如先建个地基，这个地基介于“确定和模糊”之间，介于“有和无”之间。再往里看，这个政权亦是如此，相当暧昧，书中说道：

帝国的贵族也是聪明又暧昧的，他们虽名为仆从、朋友，实际上各怀鬼胎。他们对皇权形成反制，并且不停以阴谋，想尽办法将统治者弄下宝座。帝国虽永恒，皇帝却在王位上摇摇欲坠，甚至跌落。

可见皇帝处于一个很尴尬，也很暧昧的位置，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暗流汹涌。

博尔赫斯的《歧路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与卡夫卡一脉相承的是批评中国工人有一种“信心不足，及想象力不够的现象”。《歧路花园》的主人公余尊是青岛一所德国大学里的英文教授，他从小在一所“充满秩序与平静的对称花园里长大”，为突破所谓的想象力不够，他幻想着一一种迷宫般的花园，即“歧路花园”。

我想象它完美无缺站在某个神秘山顶上；我想象它淹没在稻田里、水面下；我想象它辽阔无边，不再只是由一些八角凉亭、通衢小道所组成，而是充满了河流、省分、王国……

于是我们看到这所花园代表了中国的完美园艺，将这里与美学融合一处，让漫步其中的人学习到其中的智慧，感觉到治理散发出的震慑力，或是奇妙的训诫。这一迷宫只消花园这一特定的空间，即可展示无疑。然而博尔赫斯想表达的远非仅仅如此，他在迷宫中看到了永恒的主题“时间”，亦可解释为“中国年代记与西方年代记的相对性问题”。

在歧路花园的时间网络上，我们并不存在于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其中一些有我没有我，另外一些有我你没有你，还有一些我们二者都存在，由于命运的眷顾，你进了我家门，在另一个里，正在逛花园的你，发现了已死的我，而在又一个里，我说着和前述相同的话，但是我只是个假象，是个鬼魂。

虽然这段描述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如果意会，亦能领悟。仿佛你与我走向历史的时间轴上，突然于某一点停下，踏入“歧路花园”之中，于是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冥冥之中，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各种可能性。

而这种曼妙的时空感和多重组合的可能性也吸引了卡尔维诺，他在其小说《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中将马可·波罗与忽必烈的对话，

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来：

波罗先做出不同姿势，各种跳跃，以及惊叹与恐怖的叫声，再表演简单哑剧，“一只鱼自水老鸦嘴里逃生”，“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从火上奔过”，接着再利用手势，加强说话的语气。“可汗戴满戒指的手，威严的回应着商人强健而灵活的手”

当我们徜徉于这些活灵活现的场景之中时，卡尔维诺笔锋一转，这些到底发没发生过，难道只是眼皮区隔了它们，那何者在内，何者在外？就在我们在徘徊于虚实之间时，作者借波罗之口说：“也许它们早已存在，早已因我们的结果，而存在我们之间”。那这种存在究竟是什么，我们如同陷入了因果链条走不出来时，作者莞尔一笑，戏笔一挥：“这都不重要，决定故事的不是故事的声音，而是听故事的耳朵”。

画龙点睛，“红楼”梦中

在作者笔下，中国犹如梦中“红楼”，奇妙变换，深不可测，而研究中国则如走进大观园，本已乱花渐欲迷人眼，主观的情愫更是雾化了这份观察。但细看，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卡夫卡借长城表达其对权威与个人努力的看法，博尔赫斯借“歧路花园”发挥，将流动的时间聚在一起，并呈现了人类意识无限多组合的可能性，卡尔维诺则借着多重记忆与经验，使得跨文化的接触与交叉成为可能。而贯穿其中的是“暧昧、因果、神秘”这样的关键词。“梦中红楼”是否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雾里看花”又是否是西方人看中国时的心态呢？史景迁最后说由它去吧，这都不重要，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这基本上也是我的看法，但是其前提假设，我不敢苟同，因为毕竟“戏笔”。

雾里看花？拨云见日

其实西方汉学的研究并总是这般玄妙，史景迁在《大汗之国》的前面章节中也有描写过诸如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太平天国治下的中国等常见话题，但如果再多翻几本书就会惊讶的发现孔飞力（Philip Kuhn）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已经把研究细化到中国地方的武装结构与国家革命之间的关系了，而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在《清初扬州文化》中，则把触角伸到被历史淹没的扬州名胜古迹，通过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等去探究清初地方身份认同的演变历史。可见研究之细，功力之深。如果说上述种种还是在不同层面“务实”的话，那卡夫卡等三篇文章就相当“形而上”，也相当有“意境”了。这样的方法能否用到当下

中国的自我建构？又是否有益于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呢？笔者认为有三个层次可供思考：

第一，如何认识自己。西方汉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在西方汉学家眼里，中国是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个存在。但我们自己呢？“何为中国？谁又是中国人？”实际上，旁观者未必清，自知者却必须明。当下对中国有很多解读，天下体系也好，新世界主义也罢，不管哪种，我们要明确的是“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建构的，中国当前内部外部存在的问题有哪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等等，只有认清自己，进而才能从相对位置出发，通过营造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自己。

第二，如何认识他者。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我们往往会形成两种错误倾向，第一，为思维定势或刻板印象束缚，笔者在今年中俄暑期学校里，就曾这个问题，和俄方同学组成课题小组，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多达十多种，如中国人什么都吃，包括猫、狗等宠物；中国人不会当面表达真实想法等，相对应的，中国人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也很多，如俄罗斯很冷，俄罗斯人爱喝酒，每天都吃土豆，俄罗斯女生很漂亮，但中年以后身体会发福等。但实际上，这些刻板印象只有不到 1/3 是正确的，而绝大多数是偏见，正是这些过分强调特殊性的偏见，让我们往往会忽略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选择，因而当出现问题时，所能选择的选项也只有“就这样吧”，从而路径会越走越狭隘，并造成很多误解。这样的刻板印象限制了选择的多元性；第二，主观色彩浓厚，在系统进行国别研究时，研究者往往要么喜爱、同情对象国，要么贬低、疏远对象国，当然前者居多，而这恰恰会带来研究结果的主观随意性，并影响读者。所以将对象国作为一个实体加以客观研究，而非“戏说”，才更加科学。因为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是大师，都能化戏谑为神奇。如笔者的普通人还是循规蹈矩地按照科学路径，才是最合理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在研究中还是需要大师戏笔，一笔便可点睛。

第三，如何实现跨文化交流。首先笔者看来跨文化交流是一个“多重双向/多重多向刺激——反应”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可能有时顺利，有时不尽如人意，但是一旦进入这个过程，再去完全区分彼此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避免一种倾向，即“文化本位主义”——把彼此的文化具体化，然后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上，去和对方进行交流，这是不可取的，而应该共享这个过程，至于这个过程的内涵，比如有双方的、甚至普世的历史传统、

道德理念、哲学伦理等。再次，无论是人对人，人对集体抑或集体对集体的跨文化交流，都应当事先对“知觉与错误知觉”有一定认知。一方在认识对方之前，肯定是对对方有一个既定的假设的，同时自己也保有一份既有的认知，那么当这种反馈不符合预期时，就会形成一定的错误知觉，必然会造成误解甚至冲突，而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做好心理准备。

从西方汉学谈到当前中国的自我认知和区域国别研究，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过程。科学的研究必不可少，有情怀的戏笔亦增情趣。但无论人对人，都需要以严谨的态度，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感知，哪怕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亦可“难得糊涂”，曲径通幽。

（责任编辑：刘畅）



如歌的行板

赵舒婷*

独登高台，映入璀璨的星河
无论夜行落魄的归人，无论少不更事的孩童
无数远方的人
只要你与我，曾一同仰望这亘古的星云

每一朵努力绽放的花
我知道她日夜祷告，渴求爱人的目光
即使她毫不在意一个无关者怜惜
我也愿为她虔诚的花语流泪

街角黑黄交杂的猫
矫健的一跃，没入沉寂的黑丛
带走了谁的梦境
你安静地向我走来
静默的一瞬
难道是神秘的偈语

我知道那个流浪歌手深深地爱恋着那个跳着精灵舞蹈柔媚的女子
红莲开开叠叠在六弦琴叮咚的震颤
袅袅的余音
究竟化成了最浓烈醉人的酒，最撕心裂肺最压抑的哭

我是那个悄悄抬头看星星的小孩子
我不会捕捉清脆的音调，也无法扭动笨拙的身躯

* 赵舒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如果我的笔触能够呵护一片温情
那也是无比的快慰
最动人的不是深夜哲学的交谈
而是日复一日柴米油盐的倾听
写下这个故事，如同太虚幻境的司命
我也将负篋远行

呼唤，呼唤，我听见风的子曰诗云
赶路，赶路，是迎往望断天涯的日暮
瀚海阑干，冰霜满地
唯愿曾有一刻，献上我浅浅的安慰

（责任编辑：刘畅）



冯绍雷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作“莫斯科是否冬去春来：关于俄罗斯前景的国际争论”讲座



2015年1月28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上海图书馆邀请，于上海图书馆讲座厅作了题为“莫斯科是否冬去春来：关于俄罗斯前景的国际争论”的大型宏观信息讲座。讲座围绕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在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是否能够转危为安这个问题展开。

冯教授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有效入手，分析了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国内金融业、能源领域、军工领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西方制裁虽然对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打击，但是其最终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在分析了西方制裁的影响之后针对关于乌克兰危机何时结束的问题，冯教授进一步分析到，金融危机之后发挥主导作用的德国在此次危机中选择与美国合作，共同打压俄罗斯是此次危机难以化解的原因之一；然而页岩气革命的兴起使得美国在此次危机中更是如虎添翼，或许使得俄美关系成为了解决此次危机的最终轴点，因此危机的解决最终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之间关系的走向。与此同时，普京作为有领袖权威的领导人，在带领俄罗斯走出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吉尔吉斯斯坦前政要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



5月20日，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杰克申库洛夫（Alikbek Dzheshenkulov）和前经济发展部长巴依古特吉耶夫（Jenishbek Baiguttiev）一行到访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杨成副教授与来宾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黄志华副处长等在座。

冯绍雷教授介绍了俄罗斯研究中心跟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和近期重点的研究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具体安排，重点就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吉双边全方位合作提出了相关建议和设想。杰克申库洛夫（Alikbek Dzheshenkulov）和前经济发展部长巴依古特吉耶夫表示吉方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最新倡议具有浓厚兴趣，希望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合作，带动吉尔吉斯的发展。应中方要求，两位来宾还就吉国内政局、族际关系、地区安全、欧亚经济联盟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双方会谈后，主要嘉宾合影留念。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访问俄中心



2015年5月25日，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理事会主席团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教授到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做题为《俄罗斯和中国：世界变局中的俄中关系新阶段》讲座。

卢基扬诺夫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乌克兰危机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区域产生巨大影响，整个国际环境因此发生变化，俄中美三角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乌克兰危机本身而言，并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的胜利者，更大意义上只是普通民众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受到了伤害。从俄罗斯利益角度来讲，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是不能消极应对的，因为乌克兰从各个层面来说对俄罗斯意义非常重要。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得到俄罗斯本国民众的普遍欢迎。虽然乌克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乌克兰危机不会引发大国间的战争，特别是俄罗斯、欧洲等国目前已经很疲惫了。卢基扬诺夫教授还指出，目前西方与俄罗斯的较为尖锐的矛盾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直想融入西方，但一直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现，俄罗斯只能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寻找自己的内部平衡，并审视自己特殊的“欧亚国家”的身份。

在谈及“一带一路”问题上，卢基扬诺夫教授强调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经济提法，它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空间概念，对整个区域空间重要意义。尤其

在目前整个欧亚空间 中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衰落,以及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这都使“欧亚”角色更显著。这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传统意义的地缘政治概念。

此外,关于中俄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卢基扬诺夫也坦言这是现实存在的。特别在具体的问题的具体的利益上中俄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卢基扬诺夫也指出这种国家间的分歧是正常,但中俄之间的那些分歧不算什么,即便是欧盟内部国家之间也会有类似的矛盾。

讲演结束后,卢基扬诺夫还就与会者提出的有关中俄最新经济合作进展、中俄战略合作的级别、俄罗斯知识分子状况、中亚稳定状况评估等问题进行了回答。

本次讲座由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主持。俄中心师生以及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和中外学生代表参加了讲座。

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系

Brantly Womack 教授来访讲座



2015年6月15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系 Brantly

Womack 教授到访我中心，并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Beyond Hegemony: China US Rivalry in a Post-Hegemonic World”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俄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我院部分师生参加本次讲座。

Brantly Womack 教授指出，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两国并不是相互对抗而是相互拥有不同的利益。教授从三方面来说明中美关系的非“冲突性”，首先，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两国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竞争并不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对峙的情况。其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关系不能用划分冷战两大阵营的方式来区分中美两国。第三，中美两国根本战略都是根据新的形势来塑造的，两国之间的竞争是为了加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就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竞争来看，教授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并非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两国在各个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与冷战美苏关系完全不同另外，Womack 教授还指出，当前中美两国在国内问题上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应对最后，Brantly Womack 教授做了总结，提出如果美国要遏制中国，实际上是在自我遏制。中美两国的合作大于竞争，特别是中美两国高层更要积极地推动合作。

讲座结束，我院师生与 Brantly Womack 教授就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及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因素进行了互动。

哈萨克斯坦学者阿姆列巴耶夫访问我院



2015年5月13-16日，正当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际，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首任总统与国内政策中心主任阿姆列巴耶夫先生应邀访问我院。

其间，与我院教师举行了座谈，双方就乌克兰危机、欧亚经济联盟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贝文力书记、刘军副院长、潘兴明教授、包承柯副教授、姜睿副教授、肖辉忠老师和郑润宇老师等参加了会谈。之后，为师生们作了题为“欧亚经济一体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演讲，集中探讨了中亚地缘政治问题、中亚国家对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看法和反响、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对中亚的威胁及哈萨克斯坦的应对等问题。演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我们了解2013年以来的中亚及后苏联空间的政治、经济形势提供了来自中亚国家视角的全方位的解读和思考。会谈和讲座都由王海燕副教授主持。

第五届莫斯科暑期学校圆满落幕



2015年7月2日—8日，以“Eurasia 2020: New Scope of Cooperation”为主题的第五届莫斯科暑期学校在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15名硕博研究生以及来自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大学、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同学参加了此届

暑期学校。

7月2日上午,来自中俄的暑期学校学员共同参观了气势磅礴的红场,领略了俄罗斯艺术文化的博大与悠远。下午,在俄方志愿者的陪同下,学员们参观了莫斯科大学校园。

7月3日,第五届俄罗斯暑期学校正式拉开序幕。以冯绍雷教授为代表的中方授课教授团以及以卡拉刚诺夫为代表的授课教授团围绕着 Eurasia 和 one silk one road 这一主题,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场思维风暴。

在暑期学校期间,高密度、高水平的讲座、讨论、兵器推演谈判接连不断,但双方学员认真聆听、快速书写和踊跃提问的影子让人印象深刻。

在这期间,4日晚、6日晚分别举办了了中国文化之夜和俄罗斯文化之夜。在文化之夜中,中俄双方学员通过各种形式尽情地为彼此演绎悠久传奇的历史和文化。文化之夜不仅加深了彼此学员中俄文化的理解,同时也于互动中增进了友谊。

7月8日,当收获了知识与友谊的学员们从教授手中接过结业证书时,心中既兴奋又不舍。为了推迟说再见的时刻,俄方学员和志愿者又陪同中方同学参观了察里津诺庄园和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这再一次让中方学员领略了俄罗斯艺术的瑰丽。

每一位中方学员都赞叹“参加此次暑期学校将是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我们不仅享受了艺术的熏陶,收获了知识、友谊,更多的是近距离地感受了俄罗斯的思想 and 精神。”

第六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在我校启动



“今年是华东师大第六次举办上合组织暑期学校，这项活动之所以能在我校举行，或许正缘于我们和上合组织之间的特殊感情”——面对 45 名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身穿民族服装的大学生，梅兵副校长充满感情地说道。

7 月 20 日，由上海市教委主办、我校国际教育中心和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承办的“201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在逸夫楼举行了开幕式。副校长梅兵、上海市外办欧非处副处长余强、校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黄志华、校国际教育中心副主任王钢、国关院-上合研究院院长冯绍雷、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促进中心秘书长潘大渭以及来自我校国关院、俄语系、数学系等单位的师生代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观察员国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的外交官也应邀出席。

梅兵在致辞中强调，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不久前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15 次会议成功举行，在此背景下，举办以“纪念伟大胜利、促进和平发展、增强了解融合”为主题的“上合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从 2010 年起，学校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上合暑期学校，

到今年是第六年，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项传统。除此之外，学校还积极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目前在我校的外国留学生中，有 300 余名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这一规模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中。不仅如此，华东师大作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国家重点大学，很早就设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每年编纂出版上合发展报告，为相关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意见，成为了上合组织研究的重要基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沪总领事佐·克拉巴叶夫在讲话中指出，近几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发展突飞猛进，在科技、文化、教育、旅游、人文领域的合作尤为显著，暑期学校活动有利于各国年轻学生互相交流和理解、夯实友谊。俄罗斯驻沪领事丹·鲍里索夫对暑期学校启动表示衷心祝贺，感谢华东师大为深化和加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人文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并表示相信，暑期学校的学员将拥有难得的机会，不仅可以接触到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现代生活，还可以深入了解彼此的兴趣和观点，深刻体验合作的精神，深刻体验包容、平等和尊重观点与民族发展多样性的精神。白俄罗斯驻沪领事安·特瑞布什说，在不久前的上合组织乌法峰会上，白俄罗斯成为了观察员国。他诚挚地祝福参加本次活动的大学生在游学活动中顺利、快乐，希望他们能够汲取新的知识、建立友谊、互帮互助。冯绍雷教授表示，上合暑期学校是将上合宗旨付诸实践、推进上合建设与发展的一个具体和务实的项目，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上合成员国、观察员国青年朋友间的了解与沟通，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尤为重要。上合问题专家、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阿·阿姆列巴耶夫，学员家长代表、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理事伊·丘马科夫斯基，2012 年第三届暑期学校学员、现在我校攻读硕士学位的克里斯蒂娜·舍甫琴科等也发表了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梅兵宣布暑期学校正式启动，并将旗帜授予身穿民族服装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学生代表。随后，我校艺术团的同学献上了极具中国民族特色以及俄罗斯、中亚风情的声乐、器乐和舞蹈节目，将启动仪式再次推向了高潮。

今年的上合暑期学校为期四周，活动内容包括专题讲座、汉语学习、文化考察、圆桌会议、创意大赛和民俗体验等。

（内容摘自国关院官网）

（责任编辑：杨静）



《闻道》征稿启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际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我们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人与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征稿栏目主要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以及文艺专栏等。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刊登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来稿字数在10000字左右为宜。学术思想随笔(含书评)主要刊登古今中西经典著作阅读、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3000-6000字为宜。文艺专栏主要刊登文化艺术类题材随笔,如文学、电影、音乐、戏曲、旅游、时尚等,2000-5000字为宜。

来稿时敬请作者注意: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属于内部发行,不影响投稿之后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
2. 来稿需为word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可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3. 投稿作者同时需要提供200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通信地址、电话等),以便于后期邮寄期刊和支付稿酬。
4. 本刊对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评审意见会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作者。我们会在2个月之内给来稿作者以回复。
5. 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本刊对决定刊登的稿件可作必要的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6.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wendao_ecnu@sina.com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414A,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邮编: 200062

网站: <http://www.saias.ecnu.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532279030>

新浪微博: 闻道杂志社, <http://weibo.com/u/2532279030>



《闻道》编辑部



S A I A S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